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 年 1 月 31 日创刊 2013 年 12 月 30 日第 27 期

本期目录

【四川文革专辑 2】

蓦然回首

杨宝智 一个“右派”参加造反派宣传队的经历

刘国平 一生难忘的血火记忆

故纸堆

程占彪 我初步坦白交待反动组织“三老会”的罪行

渔歌子 录入提供 成都军区梁司令员、刘结挺副政委接见开江、万源、巴中等
七个县驻军负责同志、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的讲话

编读往来

李辅、晓星谈《是谁杀了王尚志》

庄菁瑞谈唐山交大

【蓦然回首】

一个“右派”参加造反派宣传队的经历

杨宝智

作者简介：杨宝智教授，1935 年生于广东佛山，1952 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师从著名音乐家马思聪先生。1957 年毕业时被打成“右派”，到重庆市歌舞剧团“监督改造”，后任首席小提琴演奏员、乐队指挥。文革中饱受磨难，曾为普及“样板戏”废寝忘食作出贡献，曾参加造反派宣传队到四川大规模武斗“武装支沪”前线演出，在枪林弹雨中热情创作讴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雄烈士”的节目。后因闲聊中一句戏言差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改革开放年代先后在上海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和四川音乐学院任教，在小提琴演奏、教学、作曲、弦乐艺术史诸方面均有不凡造诣。1996 年退休后定居于香港。

从“右派”改造成为“摘帽右派”

1952 年我告别香港，在广州经马思聪院长面试，考上中央音乐学院。1956 年苏共“二十大”到 1957 年毕业前夕，因思想活跃，反对特权，主张民主选举，触犯了天条，被划为大学生“右派分子”，打入另册。眼看分配没有着落，惶惶之时，天降贵人也——当时在中央音乐学院进修的西南人民艺术剧院歌剧团团长马惠文收留了我，使我免去到夹边沟、北大荒之类农场劳改的遭遇，而去了西南的山城重庆，在该团乐队任职，成为“本单位群众监督下边工作、边劳动、边改造的右派”。

不久，马惠文调四川音乐学院，该团与重庆市歌舞团合并，成为重庆市歌舞剧团。我除了经常被派下农村劳动之外，在单位里，我在厨房帮过厨、在山城的陡坡上拉过板板车……经过四年艰苦“改造”，脱了几层皮，由于态度老实、劳动表现好，终于在 1961 年 11 月，“摘掉右派帽子”，领导宣布我“回到人民队伍中”。不论本人还是亲友们都高兴了好一阵子。

但好景不长，1962 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之后，我又很快沦为二等公民，被称“摘帽右派”，“控制使用”：忽而被指定作乐队指挥，排练为歌剧伴奏的乐曲，忽而被指认为“要夺印的阶级敌人”而撤职；有时在监管下从事农业劳动好几个月，忽而又可作为“犯过错误的干部”，加入“四清工作队”，在重庆南温泉附近一个叫做公平人民公社的农村乡下，放手让我独自发动下面一个生产队的农民，去斗争所谓“四不清干部”，尝到了“扎根串联闹革命”的味道。

为造反派演出“样板戏”废寝忘食

1966 年夏季，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推翻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且振振有词地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刹时，长城内外、大河上下……烽烟四起，各地群众纷纷响应领袖“反修防修”的号召，“造反派”们揭竿而起，“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一阵子好不热闹。

重庆市歌舞剧团当然也出现了造反派组织。这里，先花点笔墨，介绍我们团里最先起来的几位造反派人物。

先说外号“元头”的刘元才，此公是 1960 年从大学一年级招到歌剧团来当学员，学吹唢呐的，这批学员称为“四班”，以区别于 1957、1958、1959 年招的大班、二班、三班。他当时身体很好，练完唢呐之余，还常在大坝子练举重，后来结婚生了一个女儿和一对双胞胎（可惜后来他英年早逝，是我们乐队寿命最短的，而且一个儿子和女儿也都跟着他去了九泉）。1966 年国庆时，他与其他四人成立了“十一战斗队”，是重庆歌舞剧团首先竖起“造反”大旗的五个人之一（另外四人是李天鑫、胡光斗、周京鼎、陈运涛）。那时，各级干部执行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群众厉行镇压，气氛尚为严峻，他们偷偷搭火车上了北京，不久拍电报回来说“我们见到了毛主席”。但歌舞队领导陈岚却说他们是

“偷儿、懒儿、烂儿”的集合。不过，等他们返回重庆时，南下来串连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大学生已经来了很多，“歌舞剧团必须大乱！”等大字报已经贴出，他们腰杆也硬多了。在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慢慢成为我团造反派的主力。

再说善于唱歌、写歌、编剧的李天鑫。1967至1968年间，他成了重庆全文艺界反到底派的“延安兵团”司令，当时叫“一号勤务员”，是“勤务员”中职位最高的。后来又当了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以后他在成都四川省川剧院搞创作，2005年我们在成都见面时，他已经退休了，仍在忙于电视剧的编剧和作曲。

另一个是拉二胡的胡光斗。他是团里反到底派“延安公社”的“一号勤务员”，在完成“斗、批、改”（实为“斗、批、走”）后的1970至1972年间，作为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被定为“三结合”的市歌舞剧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但在林彪“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前10个月，也被派往巴县接龙区小观公社和我等“二牛鬼”一起劳动，美其名曰“领导”，实则挨整。进入新世纪后，他不幸患了老年痴呆症，2012年夏天，与对立面一派815派的群众组织代表、也是当时的歌舞剧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温福泽，几乎同时去世，这算巧合吧？

还有一位是男声小合唱演员周京鼎。外号“皮筋”，80年代后，入了党，被市文化局派到这个剧场那个剧团去当支部书记，此是后话。

群众造反到了1967年初，由于伟大领袖的左膀右臂“皇后娘娘”江青和“储君”林彪对文革的前途和做法产生分歧，以致各地造反派根据对“一月夺权”的不同意见和倚仗不同的后台，分裂成两大派，如广东的“东风派”和“红旗派”；安徽的“好派”和“屁派”；四川成都的“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和四川大学“8·26”等。重庆则有以重庆大学“8·15战斗团”为首的“8·15派”和包括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等组织的“反到底派”。两派各自都认为自己是真正“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而对方则是“代表国民党”、“复辟资本主义”、“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派”、“反革命”。尽管中央文件三令五申“要文斗，不要武斗”，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毛夫人江青却又信誓旦旦说她赞成造反派“文攻武卫”。这样，全国各地两大派双方从“打语录口水仗”，到动手打架，到用砖头、钢钎……厮杀得不亦乐乎。而在兵工厂林立的山城重庆，则在1967年夏天开始用自动步枪，最后发展到高射机枪、坦克、登陆艇……流血事件层出不穷，骇人听闻。

1967年春，正当重庆市两派开始分裂，全市陷入无政府状态之际，经过参加“四清”和文化大革命，弄得脱离文艺工作近一年，因而手痒、嗓子痒的重庆歌舞剧团乐队和重庆京剧团中偏向反到底派观点的一部分“革命群众”，组织起来准备演出“八个样板戏”之一的“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这是“上面”规定可以演出的戏，其他的文艺形式包括音乐、戏剧、舞蹈、戏曲、电影通通都被冠以“封、资、修”之名而被“一刀切”查禁了，八亿人民只能看八个“样板戏”）。由于找不到乐队总谱，无法演出（此总谱在公开出版前，属于“国家机密”，一般人不能见到）。

此时，我团乐队弹三弦和琵琶的年轻乐员、后来成为《沙家浜》演出队一号勤务员的陈朵找到我，请我通过记录中央样板团演出的录音带（80年代后这一作法被称为“扒带子”），根据重庆当时的现实——能参加这个演出队的人所组成的乐队的编制，写出总谱。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也是表现自己“真革命”的机会，所以就答应下来。这样写出一场排一场，夜以继日两个月，终于得以成功演出。此后，我一直在《沙家浜》演出队里拉小提琴。

陈朵是继我团第一个造反派组织“十一战斗队”之后起来“造反”的，1967年“二月镇反”后，他成立了“血战纵队”，这个“纵队”最初只有两个人。1967年夏天，他见我废寝忘食战高温、不计一切地“革命”，精神感人，堪当劳动模范，希望我加入“血战纵队”。鉴于当时上海《文汇报》曾登载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回答群众疑问时说过“‘摘帽右派’要加入革命群众组织必须通过严格考验”的话，所以不少人劝他不能要我，但此君力排众议，毅然吸收我为“血战纵队”成员。从此和他战斗在一起，建立起革命友谊至今。

我们《沙家浜》演出队在1967年8月1日演出完《长征组歌》之后，因重庆已经爆发真枪实弹的武斗，我们跑到成都去躲避。这段时间，我和陈朵也随到成都躲武斗的重庆“财贸9·21宣传队”到过大小凉山，前后近一个月。

我被造反派组织“劝退”

后来，《沙家浜》演出队又想排演京剧《智取威虎山》。于是，1967年年底，通过重庆“工总司”与上海“工总司”联系，我和其他几人一起被派往上海交响乐团抄《智取威虎山》总谱。抄完后，我绕道回广州老家一趟，拜见了父母。

1968年1月2日，我从广州坐火车回到重庆。刚刚进到歌舞剧团大门，在大坝子上赫然见到醒目处有一张写我的大字报，大标题是“把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杨宝智揪出来，清除出延安公社”，说我“永远是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要把我“从革命群众组织中清除出去”！落款是我们乐队的小罗。

真是五雷轰顶！

这位小罗，在1959至1961年间我右派未摘帽时，就是对我实行监管的三人小组成员之一，每周要向他“汇报思想”一次，接受他的监督训话。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歌舞剧团的乐队分为两个小组，他是我这个组的政治组长（此外尚有业务组长、生活组长）。《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后，6月8日乐队队长老孟组织写的、按批判“三家村”的调子系统批判我的长篇大字报中作者落款签名就有他。这份重磅大字报贴满排练场的墙壁，出笼当晚是我有生以来第二次失眠（第一次失眠是1957年9月3日中央音乐学院大礼堂要召开批判我的大会的头天晚上），预感将要掉下万劫不复的深渊，异常恐怖（据参与此事的、后来移居新加坡的顾老大回忆说，此事小罗表现得“最左”）。在那些“矛头指向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迫最严重的时期，我没有一天不受到他的“无产阶级专政”和“革命大批判”。不仅如此，还要隔三岔五向他“汇

报思想”，出入大门也要向他请假。造反派起来后，他是全团有名的“保皇派”，号称“铁杆老保”。但1966年11月后受到北京来串联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的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小陈的影响，思想逐渐转变，没有监管我了，我似乎逐渐自由了，可以自己上街到处看大字报而不必请假了。1967年1月初，我请探亲假回广州。2月份回到重庆得知，“二月镇反”之后，他变成造反派了。造反派分裂后，他加入了我团具有反到底派观点的“410部队”。我到上海抄谱前后，我团反到底派观点的包括“410部队”“血战纵队”等四个“革命群众组织”联合成“延安公社”。原“十一战斗队”的“老造反派”胡光斗、“元头”自然是一、二号勤务员。

小罗的大字报出来后，他们跟我说，经过“勤务组”认真研究，认为我表现是好的，不同意小罗的大字报提出的“清除”的说法，但是为免“延安公社”被对立面（8·15派）攻击为“网罗牛鬼蛇神”，“勤务组”作出“劝退”的决定，劝我为了“大局”，最好自动退出组织，但是还要“继续革命，组织上脱离了，思想上不脱离”云云。

话说这位小罗同志，在“英明领袖华主席”当政的年代，又被作为“清查运动”的对象，在团里关起来隔离审查一年多，深深体会了“被专政”原来是这般味道。胡耀邦把我的“右派”身份“改正”后，我们才建立了平等、友好、互助、合作的关系，互相帮了些忙。特别是1980年某日，我在江北指挥一个民族乐队伴奏的歌剧结束后，小罗让我坐他的摩托车先于全团演职人员的大客车提前回到大院，才发现前妻和我一位“徒儿”之间的隐情，从而改变了我后半生的家庭生活。小罗退休后在重庆郊区铁山坪建了一栋四层楼有电梯的别墅，还请我去住了几天。此是后话。

奉派参加造反军宣传队

转眼到了1968年4月初，我正在歌舞剧团一间琴房的钢琴上，埋头练习刚收到的中央乐团老同学、57难友洪威廉寄来的殷承宗编写的油印《钢琴伴唱〈红灯记〉》片段乐谱，歌舞剧团的反到底派“延安公社”勤务员、我团乐队唢呐吹奏员刘元才（外号“元头”），急冲冲带了一个穿工人劳保服、脸上有几颗麻子的人来找我。刘元才严肃地说：“杨宝智同志（我这个“二等牛鬼蛇神”，多年没听到有人叫我“同志”了，听他这样称呼，我特别高兴），五一节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将要成立（注：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于1968年4月28日成立），造反军宣传队准备代表重庆反到底派去参加庆祝大会，但缺少一个能奏多种乐器又能搞点音乐创作的人，经我们勤务组研究，认为你是完成这项任务的合适人选，现在派你代表延安公社参加他们宣传队，也可能去宜宾不久后还要去成都参加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全程大概二十天到一个月左右，你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意见，下个星期就开始排练。这位是宣传队队长，一号勤务员涂安杰，具体任务由他和你联系。”

且说当时，我听“元头”那番话后，就立刻表了态：“我本人倒没意见，但会不会又被小罗之类的人说成‘坏人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以后秋后算账，又拿出来批判，我怎么办？肯定完了！”

“元头”说：“右派摘了帽就是群众了嘛，通过这一年来的表现，证明你是忠于毛泽东思想，勇于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组织上相信你，你一定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我被他戴了高帽子，欣然答应，参加了“造反军宣传队”。

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多如牛毛，每个系统的对立两派，都有各自的“宣传队”。一般来说，宣传队的演出形式包括独唱、重唱、小合唱、舞蹈、快板、对口词、相声、评书、器乐演奏……内容无非是我们这派怎么受压，怎么“想念毛主席”，怎么“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也有宣传“最新最高指示”，“中央文革最新指示”等等的内容。我在那里无非是表演一个小提琴独奏节目，演奏一些根据当时的“革命样板戏”诸如《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的音乐片段自己改编的小提琴独奏曲，或是根据流行民歌《远飞的大雁》自己发展的独奏曲等等。当时中国的西南部，在1967年2月曾因对夺权不同意见而被军方打成“反革命”（时称“二月镇反”）的造反派，如成都的川大“8·26”和重庆的西师“8·31”、“工人造反军”等，用西藏民歌《远飞的大雁》填上如何“想念毛主席”的词，作为“派歌”，从而广为流传。这个曲调很适合于反映“受压”的人群盼望解放的心理状态，1967年春夏之交我在重庆市的大礼堂为三四千人演奏《远飞的大雁》时，就听到台下传来呜咽哭啼声。很多人都在“二月镇反”中被作为“革命对象”“专政”过，希望毛主席会像神仙菩萨一样，把大家从苦难中解救出来。

那个年代，我的小提琴独奏，是名副其实的“独”奏，真正无伴奏，因此适合于任何场合演奏。但是，从1957年打成“右派”后十年来就未曾上台独奏过一次的我，在大小凉山地区多次为“翻身农奴红色造反总团”（简称“翻奴红总”）的彝族同胞以及支持他们的“支左”部队演奏，领略到“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的滋味，不能不说是人生之一大快事。

两派的宣传队都争说自己是宣传“毛泽东思想”，但各自的“毛泽东思想”内容却不大一样。尽管如此，一大帮青年文艺爱好者可以在这些宣传队中一展身手，满足自己的表演欲、创作欲。再者，尽管不同番号的人民解放军部队支持不同的派别（都说是“支左”即“支持左派”），但是，任何为宣传队“慰问支左部队”演出之后准备的那顿丰盛的饭菜，绝不是在那个物资供应贫乏的岁月街上可以随便吃得到的。所以，“吃支左饭”对于参加宣传队的队员来说，也是非凡的享受。此外，宣传队还是为各路文艺青年找对象、谈恋爱创造机会的绝好地方。

决心到“突破口”去“接受革命的考验”

这次“元头”叫我加入的这个宣传队，全名叫做“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总部第一宣传队”，队旗上还有“狂飙轻骑”四个字，太繁琐了，故而简称

“造反军宣传队”。

由于我市歌舞剧团地处重庆繁华闹市区的中心，解放碑旁边的八一路（文革前叫“保安路”），交通方便，又有排练场。而宣传队员是由各个不同系统、不同单位、不同地区的人自愿组成的，所以造反军宣传队决定就在市歌舞剧团集中开会、排练。

第一次大家见面的时候，队长（又称“一号勤务员”）涂安杰对我说，他也是文化局系统的，不过是局下属的电影机械厂的模型工（工人的身份在当时是最光荣的），很喜欢跳舞。然后他分别向我介绍他们的成员：这是你们歌剧团乐队打打击乐的“小甲甲”的哥哥“大甲甲”，是“二号勤务员”；这位叫弋贤才，这位小伙子叫“幺妹”，这个女娃子叫三毛，后面是大双、小双、大艾、小艾、王抱焉、甜荔枝……这些都是跳舞的；这边是担任女声独唱的小眼镜，乐队打扬琴的长春，拉板胡二胡的钟锋，拉手风琴的小张……介绍完了，他说：“现在请造反军总部的宣传部长唐工同志给大家讲话，大家欢迎！”

唐工看起来很成熟，但是后来知道那时才刚刚二十出头，文革前是市大坪中学的体育教师。四十年后，我见到的唐工已是满头白发，在以“祖传医术”开医馆。他告诉我，他原名唐湘捷，他爸爸在四十年代是一名抗日川军军人，因他出生时爸爸刚在湖南参加了对日本打的那场胜仗“湘北大捷”，故给他起名湘捷。

唐工对宣传队作的动员讲话说：“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时候说了，解决宜宾问题，是解决整个四川问题的突破口，现在我们代表重庆反到底派去宜宾……”

所谓“突破口”，就是说文革前几年，宜宾地区的几个干部（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李良等）因为“坚持党的原则”，被“西南王”李井泉打击陷害，后来到中央告状，刚好“伟大领袖”想利用他们作为打倒刘少奇官僚集团一翼的李井泉的一支力量，所以当时的“中央领导”（包括周恩来及中央文革成员）就接见了他们，并说：“解决宜宾问题，是解决整个四川问题的突破口。”同时封刘、张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简称“省革筹”）的副组长和成员，封王、郭为宜宾地区“地革筹”正、副组长，李良为宜宾“市革筹”组长。他们都是支持成都的“8·26”派和重庆“反到底”派的。宜宾是他们的老窝子。造反军宣传队头一年到宜宾去演出过，宜宾方面约他们第二年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再去演出，故有此活动。

但当时“中央”要平衡各方势力，故建立四川“省革筹”班子时，除派原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将军为正组长之外，同时派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梁兴初为第一副组长。梁兴初原是三十八军军长，和驻守重庆的五十四军都是林彪的第四野战军（简称“四野”）中的劲旅，五十四军在重庆支持“8·15”派，梁兴初自然跟他们一样。这时候的形势是重庆的“市革筹”与成都的“省革筹”各支持一派，而宜宾、泸州（属于宜宾专区）在地理位置上处于重庆和成都之间，变成了“兵家必争之地”。

我们去宜宾，可能有危险，所以有些朋友劝我最好别去。但是我当时一度被小罗那张大字报整得憋了一口气，正想通过有危险的“考验”，来证明我“不是

反革命而是真革命”。于是抱着“经大风雨，见大世面”的愿望，加入到这帮从来不认识的人群中“共同战斗”。出发之前，还有一个重庆市少年宫教小提琴和舞蹈的女老师，外号“陶三”，也说要“锻炼锻炼”，参加到宣传队来拉小提琴。她的丈夫是我们乐队喜欢搞业余创作和指挥、曾经一度和我关系很好的吹长笛的同事唐福生，所以我就介绍她去找“大甲甲”。

“汪司令”介绍“前线”形势

造反军宣传队于1968年4月17日从重庆乘火车往宜宾出发，19号到达接待我们的东风矿区。这个矿区位于宜宾地区的珙县巡场镇，是宜宾地区重要的产煤矿区。作为刘、张、王、郭的“贴心豆瓣”、宜宾地区“文攻武卫指挥部”的“司令”汪文麟（外号“汪三”），就是出自这个矿区。到达当天，“汪司令”向我们介绍“当前斗争形势”，说：“宜宾问题不仅仅是宜宾问题，而且是整个四川和大西南的问题，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宜宾，是毛主席亲自选定和亲自指挥打开的解决整个四川问题的‘突破口’，但是阶级敌人妄图堵住这个‘突破口’，自从‘红十条’下达以来，李（井泉）廖（志高）死党又刮起一股右倾翻案妖风，挑动不明真相的受蒙蔽群众，搞武装翻案，北打永川、荣昌，南攻纳溪、合江，现在正向宜宾方向杀奔而来，妄图推翻新生的红色政权。上头说了，这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我们文攻武卫指挥部有许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士，正在阶级敌人给我们摆下的三百里战线上，为新生红色政权站岗。希望你们去给他们演出，鼓舞他们的斗志！”

我对宜宾地区的情况原来一点也不了解，心想，回去重庆会不会在“秋后算账”时说我“煽动武斗”呢？我就向“汪司令”问了这个问题。他严肃地说：“这是正义的战争，是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的问题，是资产阶级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阶级敌人已经向我们进攻很久了，怎么是你煽动的呢？”原来，这次叫做“第三次武装支泸”，去年已经有两次了。“汪司令”的队伍番号是“泸（州）、纳（溪）、合（江）前线指挥部98营”，后改为“东风民兵团”，代号“206”。他建议我们“到前线去看看，那里有很多感人的事迹”。

所谓“前线”，就是武斗前线。4月25日，我们宣传队换上东风矿区矿工的劳保服，出发到“南线”的后方基地、离“战线”约五十公里的上马场，边“看看”，边创作，边排练。

我们住的那个上马场属于泸州市纳溪县，场边有条秀丽的永宁河，蜿蜒的川滇公路穿场而过。我们这个“东风矿区宣传队”在去上马场时看到一队打着“416”旗号的当地中学生在操场排练文艺节目，但没怎么注意。一天黄昏，一个戴眼镜学生模样的小伙子敲开我住旅馆的房门，怯生生对我说：“杨老师，您可以教我拉琴吗？”我当即答应了他，并在晚饭后，到楼下给他上了第一课。后来才知道此人叫江瑞成，参加了纳溪中学生红卫兵“416”造反队，喜欢拉小提琴。当时我是“混入群众组织”的“二牛鬼”，怎敢不老老实实与“红卫兵小将”交朋友呢？不过朋友一交，就是四十五年的情谊。此为后话。顺便说一句，1969

年我在“学习班”内受审查期间，江瑞成曾冒着风险，从成都给我寄了不少我一时无法看到的中央文革、省革委会文件等（他想为我翻案，但在当时真是妄想）。

四川所谓“场”，北方叫“集”，广东叫“墟”，原是农民隔三岔五交换买卖农产品的地方。上马场本来很小，只有近百户人家。现在人一多，就会发生矛盾。大概大家都是“造反派的脾气”，稍有言语不合，两边就发生冲突，一天下午，前线武斗人员与“416”学生扭打，五大三粗的魁梧大汉暴打文弱学生，发生老鹰抓小鸡的一幕。我不顾自身势单力弱，在密集的拳脚雨点中冲进人丛，极力护卫弱小，破喉大喊：“不要打了，这些都是小娃娃呀！”当时我们宣传队却有不少人在旁观。新友江瑞成也卷在打斗中，幸好没有受伤。后来他对我说：“杨老师，您很善良！同学们都说您人品好！”

战火纷飞中的演出和我的“绝命书”

经过一周多的排练，我们4月27日返回宜宾市里，28日至5月1日为成立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庆祝大会及军分区等单位演出了几场。之后在东风矿区演出了几场。每天演出我均有小提琴独奏表演，基本上是两首：一首是根据“样板戏”芭蕾舞剧《白毛女》选段改编的独奏曲；第二首是根据藏族民歌《远飞的大雁》改编的《想念毛主席》，如果观众要求再来一个加演，则演奏根据“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改编的短小提琴曲。其余节目，我有时候“票”手风琴为独唱或舞蹈伴奏。

碰巧重庆反到底派各文艺团体联合组织的京剧《沙家浜》演出队也到宜宾演出，这个演出队从1967年4月成立起，我就是里面的“老人”，人缘不错。所以我在时间不冲突时也去“票”上一场。

熟人们都劝我不要介入这些专县的武斗，“危险！以后还说不清！”而且中央最近又有“4·27指示”，批评了反到底和川大8·26这一方。可是我们在上马场听“武卫战士”们讲了些“英雄事迹”和“好人好事”（收集来以备创作之需的素材），大受感动，一辈子很难得有这个“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绝好机遇，哪怕是遇到危险，生命牺牲了，也是“死得其所”。而且每天在小提琴独奏后还能享受到观众雷鸣般的掌声，所以我不愿意离去。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年初受到小罗的那张大字报的刺激。我在宜宾那段时间，老是想到小罗那张大字报。你不是说我“永远是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吗？我在这里当个“左派”给你看看，以雪“右派”之耻！

当时在宜宾战火纷飞邮路不畅，我还写了一封信，托《沙家浜》演出队的朋友带到重庆寄给我在甘肃军垦兵团的弟弟杨宝明，信上说：

“如果三个月不见信来，就是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牺牲了。我已经用实际行动改正了1957年的错误。”

这就是后来传说我曾经写过“绝命书”的来由。

5月1日之后，到矿区附近几个处（如54处、55处等）演出了几场。其中有个靠近贵州赤水的劳改矿山叫芙蓉煤矿，我们去演出过，矿上医务室的工作人

员有不少是从全国各地调来的大专毕业生，其中有位年轻的女医护小周，只要她来东风矿区出差，就到宣传队来玩，像是我的“粉丝”。听说她的对象在上海，但我从她眼睛里似乎看到什么。不过我没有和她深谈，生怕暴露我是“隐瞒身份”的“坏人”。

我们歌舞剧团以前曾经演过一个阿塞拜疆的喜歌剧《货郎与小姐》，说的是贵族青年阿斯科尔为了抗拒包办婚姻，化妆平民到处卖布以找寻理想的对象的故事。我在相对自由的文化大革命中的1968年，也曾想通过“卖布”（演奏小提琴）找对象，效果却不理想，因为但凡对方对我有一点想法时，家长就要找人了解我的“底”，结果一问，是个“摘帽右派”，就禁止女儿和我来往，害得姑娘痛苦地远离而去，如是者不止一次，其中还包括有重庆“中学生红卫兵总部”的一位相当能干的“勤务员”。

5月10日，我们宣传队到了离上马场往前8公里左右的大洲驿。当时所谓“宜宾地区文攻武卫指挥部泸（州）、纳（溪）、合（江）前线指挥部”就设在此。那时已经成为宜宾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李良，到大洲驿“代表刘、张、王、郭来看望大家”之后，我们开始天天为驻守在漫长的战线上的各个山头的“战士”及当地各个生产队的“贫下中农”群众进行宣传演出。我在这些演出中的最大收获，就是上台再也不紧张了。以前在学校，一上台就应激反应浑身发抖，现在天天上台独奏，有时候一天两场，习以为常了，上台再也没有因发抖影响艺术发挥了。这为我1979年在重庆开小提琴独奏音乐会的成功打下了心理上的基础。所以我除了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之外，同时也是“受益者”呀！

顺便说一下，20世纪60年代我在重庆市区（无论私下还是公开）演出用的小提琴，是一部相当好的意大利琴，在G弦拉旋律时，我的腮帮子都在震动，我几十年都未有过这样的感觉。这把琴的主人叫曾振东，他原是志愿军复员军人，十分爱好小提琴，住在我们歌舞剧团背后、原称民国路（文革“破四旧”后改为五一路）与新华路之间的一条叫道观井的小巷里的老宅。他因在50年代初赴朝作战时负伤（心脏二尖瓣旁有弹片的碎片尚未完全取出）在家休养。琴的来历不详，但他很希望有人能拉出好琴声来。从1963年起，他通过我团一位同事找到我，我开始隔个一两个月到他家里“过过瘾”。文革“破四旧”时，我把极少部分能够来得及转移的珍贵乐谱（如当时在重庆绝无仅有的美国版的巴赫的《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和古组曲》之类）放在他那里，得以保存下来。1967年，无政府状态之后，我们来往就比较多了，我当年4月在重庆大礼堂面对三四千观众演奏，就是借用的这把琴。后来在朋友家里聚会需要表演时，他也毫不吝惜地借给我用。（曾振东于1970年去世，时年仅36岁。）

到宜宾，意大利琴当然不能带来，“汪司令”给我找了一把矿里工会的普及琴，调整之后勉强可用。乡下嘛，琴差一点听众也无所谓，也有的时候借用陶三的琴。据说在东风矿区有一位被打成“胡风分子”的（不知道记错了没有，好像名叫冯异）有把琴，当时我不敢去找他，怕万一说不清，以后不好交代。现在想起来，没和他结交蛮可惜。1983年左右，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劫后余生

的人们，在北京第一次会面，原来“集团”中许多人彼此间都尚不认识。真是欲加之罪呀！

满腔热情投入“战地创作”

我在宣传队里的任务是“三边”：边演出、边创作、边排练。所以花了不少精力在创作上。以前写歌曲的机会不多，现在不止写歌曲，还要编点快板什么的，顶部队文工团创作员的活，“为当前的政治任务服务”，真是把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活学活用到了极至。

5月中旬，为“武装支沪”的民兵“部队”创作了《何志东组歌》。收集到的材料说：何志东是个志愿军复员军人，共产党员，在一次“阶级敌人”进攻的时候，为保护首长和同志们安全，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牺牲前发出的最后声音是使用的《人民日报》上宣传的“支左爱民模范”李文忠的豪言壮语：“不要管我”！所以我写的时候还满有激情的。组歌由“小眼镜”领唱，众人合唱，台上台下相呼相应，一片感动震撼山岳。

下旬，到了一个经过对方多次冲锋仍然坚守不动的山头，叫金盘山。想起1951年广播里经常播送的朝鲜歌曲《我守卫在金刚山上》，就写了歌曲《我守卫在金盘山上》。我自己幻觉这是和“抗美援朝”时的志愿军文工团的工作意义一样崇高。谁会知道那时候所谓志愿军们竟然是在为斯大林想要在朝鲜半岛建立一个不冻军港而卖命呢？

6月份我还写了一首歌曲《学习张显尧烈士》。收集的材料中说：张显尧是矿区55处的“一号勤务员”，贫农出身、共青团员，对同志十分关心爱护，对“受蒙蔽群众”作了大量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平常爱说：“这里危险，我来干！”最后为“掩护同志”而“牺牲”。但我觉得这首歌没有何志东组歌写得好听。

“金山坡一役”后，我写了个快板书。6月10日晚上，206团高机连（高射机枪连）开全连“好人好事”总结大会，我在那里收集材料，后来因为太晚了，没有回宣传队睡觉而睡在他们连部。半夜突然听说“有情况”，要调高机连到前面去。不料六班扛子弹箱的“战士”病倒了两个，我为了“锻炼自己”，并证明我是“忠于毛主席的，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怕牺牲的左派”，就扛起子弹箱跟着“部队”出发了。

拂晓到达“战场”附近田坎的石板路上，听见几梭子机枪子弹从头上呼啸而过的声音，我赶忙按照以前看过的小说写的趴倒在地上。后面的人问我：“是不是受伤了？”我说：“没有，误会。”又爬起来跟着大家向前走。把子弹箱送到指定的高机连阵地后，我就被安排在隐蔽地方“观战”。由于有薄薄的晨雾，也没有“观”到什么，只知道互相间歇地对射了些时候。以后，又转移了两次“阵地”，我都是扛的子弹箱。此次“战斗”于早晨9时多结束。后来我写了个快板，名字叫《高机连好人好事多》。歌颂他们“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以及善于“作政治工作”瓦解“敌军”。这是“体验战地生活”的成果。

说起来好笑，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宣传队所宣传的基本观点和内容就居然是：

“对‘武装支泸’的态度，是考验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试金石和分水岭”，和“每个人都要在这场革命战争中经受考验”之类现代人觉得不可理喻的东西，但这些提法在当年《宜宾日报》上天天可以看见。

我们的文艺宣传的口号大概有：“武装支泸好得很！”“武装支泸亚克西！”（“亚克西”是新疆维族语言，意思是“好得很”，当年流行于红歌唱词中）“武装支泸大方向就是正确！”“武装支泸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国民党，踏平麻联站！”“不消灭麻匪不回家！”“誓向麻匪讨还血债！”等等。不可理喻吧？

现在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做“麻”，其来源是：文革初期，重庆市委为了动员官办红卫兵“保卫市委”，曾给保守派红卫兵发麻饼（面上有一层芝麻的冰糖心饼），故造反派就把保守派红卫兵称为“麻子兵”。后来造反派又分裂，较为激进的那派就把对立派称为“麻派”。对方泸州的群众组织“红联站”，就被称为“麻联站”。至于“匪”的说法，来自20世纪中，早期合作一起打军阀和打日本的国共两党在内战中互称为“匪”：国民党称共方为“共匪”，共产党称蒋介石为“蒋匪”，称国民党领导的军队为“蒋匪帮”。文革中造反派分裂后沿用此称呼，互相指责对方“代表国民党”，从而互骂为“匪”。

为了“体验生活”，我还参加了“武装泅渡”的训练。1956年初我在中央音乐学院学生会当军事体育部长的时候，学校团委派我在寒假去学射击，那时中央音乐学院还在天津。海河都结冰了，自然没有办法进行“武装泅渡”的训练。到了1968年夏天，“东风民兵团”在永宁河进行“武装泅渡”训练，我自认为游泳还可以，自然想补这一课。宣传队领来四支七九式步枪，我领了一支，和其他三人一起参加到民兵训练中去。开始下水后，怕枪沾水，下意识地老把它背出水面上，于是又觉得枪出奇的重，游起来特别费劲，而且枪杆随着沉浮把后脑勺一下一下地打得很痛——这个感觉在几十年后的现在都记得。后来才找到斜着背、让它和人的身体一起沉浮的办法，浮起来时它的木质部分还有浮力，可以帮助我人体上浮，就不费傻劲了，枪杆也不打头了，游到终点还没有落后。但是“东风民兵团”有个叫孔凡培的矿工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带病来参加“武装泅渡”，没能游过永宁河，而被河水吞没，“牺牲”了，领导上叫整理他生前“学雷锋”的“优秀事迹”材料，准备编节目上演。但我没编出来。

一次翻车事件，带来了宣传队人员思想情绪的大动荡。

我们自从到东风矿区后，“汪司令”派了一部泰托拉运输车给我们宣传队专用，配了一个专职司机，人称赵大汉，重庆南桐矿区人氏，对我们这些重庆来的人特别关照，让我们生活上过得很好。加以我们和参加“武装支泸”的民兵一样，不单吃饭不收粮票，而且顿顿有肉吃，在那个年代是相当难能可贵的（在重庆一个月一人才只有二十几斤粮票、半斤肉票），所以大家都生活得很开心。但是有一天转移演出场地时，天刚下过雨，泥巴公路打滑，到一个急转弯时控制不住，卡车就翻到公路旁的稻田里面去了，连人带乐器道具全部倾倒散落在稻田里，坐的坐、卧的卧，一副狼狈像。幸好是水田，又有未割的稻草垫着，基本上没有人员伤亡，只有一位女生个别地方软组织挫伤。

但是此后“回重庆保平安”的想法就在宣传队萌生并蔓延。而且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也已经在5月底成立，并没有得到要我们去成都演出的通知。于是，六月下旬，大队伍就回重庆休假了。

一句戏言埋隐患

从1949年起，中国就陷入不断的“运动”中。“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遍及工业、农业、文化、政治、军事各个领域，无所不在，不仅有政治运动、经济运动，而且还有思想运动。直到历时十年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历次“运动”中都有一部分被冤枉打成“地主”、“富农”、“胡风分子”、“反革命分子”（包括在国民党时代政府机关或军、警、宪、特中任过职的“历史反革命”和1950年之后具有异端思想及言论、行为的“现行反革命”）、“三反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地方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变节者”、“不法资本家”、“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四不清干部”、“反党集团”成员、“叛徒集团”成员等等“革命对象”，因而受到不公正待遇（杀、关、管、斗、批……）的人，数以百万计；每次运动还会规定整人指标：1%、2%、3%、5%……所谓“一小撮”，加起来就是好几千万。而他们的子女，都一律被称为“出身不好”的人，受到各级官僚及各种“政策”的歧视，甚至他们的亲属、朋友，都受到某种程度的株连。

文化大革命一爆发，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官员大部分都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被打倒，上面所说的这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的子女、亲属、亲戚朋友，再加上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被打成“反动学生”、“反党集团”的，也加入到“受压”的人群中，他们多误认为毛主席一定会解放他们（在三千年中国皇权专制社会里，民众总以为“皇帝是好的，坏的只是各级贪官污吏”），因而许多人都参加到造反派中去。造反派分裂之后，这里面的许多人，再加上1967年初“二月镇反”中被打成“反革命”、“反动组织”的成员，自然而然地参加到周总理所谓比较“激进”的一派之中，起码同情和持有这一派的观点（不满意一部分人倚仗权势压迫另一部分人的现实）。“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的成员中，就有不少是这类人。所谓“造反军牛鬼蛇神多”，其宣传队的成员也不例外。

1968年夏天在东风矿区，有一次白天演出，晚饭后没事，造反军宣传队中几个“出身不好”的男队员和我在一起“摆龙门阵”（闲聊），谈到“个人问题”（婚恋大事）不好解决，当时女方特别是女方的家长，都很看重男方的出身、成份，若是成份“高”了（即“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等的子女），女方家长就会坚决反对，好事就得告吹。而我，不但是“子女”而且本人就是“摘帽右派”，更为困难。所以大家悲叹：我等人要办喜事，恐怕得到了2月30号了！——大家都知道，2月平常只有28天，闰年也就29天，没有30号的。小伙子们开玩笑说：“干脆成立个2·30兵团算了。”那个时候是“大民主”时期，随便一个人都可以成立个“战斗队”、“战斗团”甚至“兵团”，无须登记，也不犯法，更没有

什么“维稳办”来“和谐”你。说完了不成立也无人追究。

殊不知，就是茶余饭后这样一句戏言，导致我们两年多之后身陷“牢狱之灾”。

在“纳溪战役”的枪林弹雨中

第一期宣传队员回重庆之后，我因为怕见小罗又给我写大字报，就和涂安杰留下在矿区“体验生活”，归“206团部政宣组”照管。这个阶段，我这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辈子以来第一次和纯朴的“工人阶级”同吃同住一同生活，感觉到涂安杰人很忠厚老实，对我很诚恳。

7月初，李良到“东风民兵团”进行战斗动员，还作了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执行毛主席有关俘虏政策”的报告。一连几晚，都有数十辆运送武装人员和武器的卡车经过上马场到“前方”。我心想，这肯定是形势报告中说的“解决四川问题的淮海战役”了。我要实践自己“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红十条”的誓言，积极争取参加这次“战役”。

这时宣传队只剩我和涂安杰二人，汪文麟以“搜集第一手资料好编节目”为名，批准我们参加“纳溪战役”。出发之前，涂安杰从206团给我们二人每人领了一支七九步枪和十发子弹。因当时弹药不足，我们属于“非战斗人员”，不能多领。

此次“战役”于7月3号晚上开始行动，由李良坐小汽车来来回回亲自指挥。我们二人和医护大队（包括小周）随“团部第一指挥所”出发，原定拂晓4点钟各部要进入纳溪东面的“阵地”（朝阳观），完成包围圈，但因下小雨，天黑路滑，走的又是山路田坎，所以虽然急行军走了一夜，仍然未到达指定的目的地。

第二天（4号）拂晓，雨停了，全线总攻开始，其他各部已经接火打响，我部于上午8、9点钟到达朝阳观，发现并无“守敌”，就向一个叫“七块田”的地方前进。坏了！由于天亮了，我们完全暴露在“敌方”的火力下。在向一个山头前进时，我方曾冲到离对方的工事二三百米左右，但是在很不利的情况下仰攻，越前进枪弹越密。后因对方的重火力实在太猛而不能前进。我们几乎被打散了，漫山遍野地各自为战，牺牲很大，有些班减员后只剩4、5个人。

我只跟着旗手朝着前方走。当时思想很简单，集中在“死得其所”四个字上。想着电影镜头上：旗手倒了，我接上去把旗子举起来继续前进，如果我再中弹，就“壮烈”了。在通过两个山包间的一个三四十米的开阔地时，我听见头上的“丝丝……”声，我想大概是炮弹来了，赶紧卧倒，刚刚挨到地下，炮弹在左前方几米爆炸了！幸好，只埋了一身泥，没有受伤。前面受伤的，抬他的人又受伤了，我就冲回去通知担架队。

这一天，双方在“七块田”这一处呈对峙状态。当晚在山坡上的红苕田里露宿。但是其他战线“兄弟部队”进展很快。5号早晨，我们发现对方全线撤退，并向“三猫石”方向突围逃窜。我随“第一指挥所”前进，到达山脚时，一位“指挥员”（好像是“方营长”，也许是老王）身边无通讯员，就请我带了一个口信给位于右翼的高机连和炮连：“告诉他们我们上去了的几个连的位置，不要打到自

己人头上。”半路上要通过一条河沟，有七八十米被“敌方”半山火力封锁的石板桥，我用大学时候百米冠军的速度跑过去，前后左右都是子弹飞，居然毫发无损。口信带到之后，在各个连队配合下，对方“红联站”的部队向桂圆的产地蓝田坝方向溃退，

整个“战役”于下午4时左右，以我方占领纳溪县城而结束。我的七九步枪和十发子弹都原数交还涂麻子，由他交上去。所以后来在“学习班”中交代：虽然我在中央音乐学院读书时，作为军事体育部部长，曾经担任步枪射击教练，但在此次“战斗”中却并未射出一颗子弹，这都是真的。

不过这之后，有一种自我满足的情绪，认为我这是通过枪林弹雨的生死关的考验，经得起从严审查的，以后谁再给我发难贴大字报，我可以说：“老子改造好了，对得起毛主席！”

记得“打扫战场”时，我曾和别的“战士”一起检查对方尸体，抬起一具尸体的手时，听到似乎发出“鼾声”，先还以为这人未死，一怔，再反复多弄几次，都是一样的，才断定他真的死了。伸手到他胸前的衣袋里摸出他的工作证一看，是泸州化工厂的老工人，共产党员，在随身的《毛主席语录》中写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决心书。

我当时幼稚地想：“麻匪”不是面目狰狞的匪吗？怎么他们也是“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大概也是“受蒙蔽”的吧，不过不敢说。四十多年后，才知道这就叫“教派武装冲突”。就像阿拉伯世界中互相打得个不亦乐乎的伊斯兰教“什叶派”和“逊尼派”，都信一个“真主”，都视一本《可兰经》为圣经；我们当时武斗的两派也是奉毛泽东是“大救星”，用同一本《毛主席语录》作为圣经，不是“教派武装冲突”又是什么？

“纳溪战役”结束后的黄昏，遇到芙蓉煤矿医务室的小周姑娘，看到彼此都还活着，一双紧握对方的手久久不松，眼里饱含的温存可想而知，就差点现代时髦的“热烈拥抱”了。但是故事到此结束，此后再也没有遇见过她了。伊人可好？

为“造神运动”吹喇叭

不久，涂麻子回重庆领来第二批宣传队员，人全部换了。“指导员”是造反军总部“组织部”的，外号“哈尔滨”；报幕员是原来在重庆市话剧团的年轻演员，绰号“飞机”；代替“小眼镜”唱女声独唱的是男高音（民族唱法）大成；乐队只有两个人，一个吹笛子的彭同华，另有一个吹笙的叫王明，是桐君阁制药厂的业余文艺积极分子；跳舞的有重庆水厂的何锡报等四五人，女生“大眼镜”、Z等四五人。

不知道“上面”局势有什么变化，仗打得少了，我们宣传的内容好像也悄悄地改变了。几乎所有歌、舞节目都要重新创作，总的来说是为“造神运动”吹喇叭抬轿子。

7月，中央文革公布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意图是篡改历史，说刘少奇赖以成名发家的安源煤矿的工运，原来不是刘少奇领导的，是毛的功劳。我也跟着

写了表演歌舞《毛主席来到安源山》。

8月，我写了表演歌舞《毛主席送芒果给工宣队》。当时所谓工宣队，全称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968年7月28日，“伟大领袖”以召见“学生五大领袖”为开始，将全国造反派头头控制住（不久之后都以各种罪名投入牢房），而以“军宣队”和“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管辖一切，用“办学习班”的办法搞“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实行红色恐怖，大家“只许规规矩矩”，没有人敢再“乱说乱动”。但是我“不知死之将至”，还为这个歌舞写了个很优美的曲调，节奏是三拍子的。20年后中央音乐学院三弦老师委托我为三弦写教材，我就把这个曲调用在一首教材乐曲《月琴叮叮》里面，这本三弦教材在21世纪还出版了。

此外，我还为毛泽东的三个圣谕（“最新指示”）谱写了“语录歌”，写了“对口词”《打倒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等，那时没有法律，圣谕就是法律。

第二期造反军宣传队的活动范围在纳溪县城以及在长江边的泸县弥陀镇、佛荫镇等地附近。我们住的地方多半是当地的一些小学或是庙堂的楼上，由“战士们”打扫干净给我们住，男宿舍和女宿舍中间拉一条布帘子，楼下的空地则便于排练节目。

有一天上午，男生在底下排舞，女生大部分出去逛街，我有点感冒，不舒服，躺在床上。布帘子的另一方有女生说：“杨老师，你小心，有人说我们宣传队里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好像矛头是指向你的哟！”我拉开布帘子，一看是Z，她是1964年到川北平昌县凤凰乡的知识青年，最近经常听我练琴听得入神（那时我在改编一些“红歌”，如电影《农奴》的插曲等）。看来这时“卖布”有点成绩了。

那时候已经是夏天，大家热得没处躲的时候，会游一点点泳的宣传队员，都爱到堰塘游泳，不过那时大家都“封建”，女生都是穿长袖长裤的演出服去游的。有两次Z邀请我和她一起去，理由是某男士有对她图谋不轨的倾向，而我则是她所信任的，可以在近距离起保护她的作用。在她换衣服时，还请我背对她为她站岗。因为那时我行动上表现得十分道貌岸然——其实我是“有那个贼心、没有那个贼胆”的。

9月，全国除台湾外，各省的“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实现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在全国两派进行“大联合”、“回本单位进行斗批改”的大趋势中，我们于9月21日离开东风矿区。

我与汪司令汪文麟五个月来结下深厚的“战斗友谊”，此时依依惜别，并赠诗《七律》一首给他，开头两句是：“永宁河畔烟已散，歌乐山顶雾正浓”。寓意宜宾的仗虽然打完了，重庆的局势尚不明朗，我回重庆前途未卜。他豪爽地说：“回重庆遇到什么问题你就推到我身上就行啦！”

9月22日晚为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学习班演出。演出前曾经到宜宾地区文工团借小提琴，第一次他们不借给我，因为我们穿的是东风矿区的矿工衣服，半年来的“战地生活”，显得又黑又脏，没有人知道我是谁。后来大概是里面有什

么人看了我们彩排，回去说了什么，不久就有人自动拿几把琴来，很客气地让我选，问我想借哪一把。我挑了一把最好的来演出，并且结识了一些同行。

演出后离开宜宾，25日回到重庆。“国庆”前后在大众游艺园及重庆体育馆为一些单位成立革委会演出，10月7日在为造反军的“平山倒旗大会”举行了最后一场演出之后，宣传队宣布解散。

此时全国“教派武装冲突”也基本结束。后来知道，三年之后，“汪司令”也跟“蒯司令”（当年北京高校的“五大领袖”之一，北京清华大学学生领袖蒯大富）等全国各地的派头头一样被投入牢房。1985年我借调到中央音乐学院时，还收到他从牢里写出来辗转送到我手上的信。1988年寒假，他已经出来，还到重庆市歌剧团里面找我，刚好我回重庆评职称时遇上了，他给我留下了成都××街“汪洋沙发厂”的地址。可惜后来我到成都工作时按地址找他，该厂已经搬走。不知道他现在怎样了？愿他平安无事，不要像“蒯司令”那样只能坐轮椅才好。（近年我在深圳和蒯大富巧遇，跟其他朋友一起饮过几次茶，开头几年他很精神，很健谈，最后因为管不住嘴，迈不开腿，以致中风，住到疗养院去了。）

关进学习班写交代

1968年10月，实到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不到半数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了。《全会公报》宣布，原定的“接班人”刘少奇被作为“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打倒，永远开除党籍，永世不能翻身。

冬天，重庆市革委从制作坦克的兵工厂——对外称为空气压缩机厂（简称“空压厂”）——抽调“工宣队”进驻重庆市歌舞剧团。“工宣队”的政委由我团马路对面的成都军区转运站的徐某担任。由于他对人太凶狠，说我团“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有一次他过马路到我团上班时，刮起一股“阴风”把他的嘴巴吹歪了，所以大家背地里叫他“徐歪嘴”。没过两年、死于癌症。

附带说说，每个单位进驻工宣队时，都要行一个仪式：找一队“根红苗正”的人，每人捧着圣物——人造“芒果”复制品，在《东方红》乐声中，缓步从观众席走上主席台。当时四川除了我这样的“老广”外没有人见过芒果为何物，都模仿报纸上的照片用蜡做成西瓜大的模型，我想笑又不敢笑。

很巧，驻我团的工宣队正队长姓傅，副队长姓郑，人们分不清：到底称为“郑副队长”好，还是“傅正队长”好？

工宣队进驻后，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我等30余位“历史上有问题”的、但又称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畴的人（区别于当时还未摘掉“五类分子”帽子的正牌“牛鬼蛇神”，称为“二等牛鬼蛇神”，简称“二牛鬼”），被关到重庆人民剧场写交代材料。

我除了写十七年来如何为“文艺黑线”服务、当右派如何“反党”外，要我着重写团里面的人们看不见的、如何参加“武装支泸”的材料。我当时自以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有功，如实书写，写完之后，工宣队还要我找证人，我就写：“以上证明人：宜宾珙县东风矿区文攻武卫指挥部民兵司令汪文麟；重庆大坪电

影机械厂模型工涂安杰。老实交代完毕”，一点也不担心。

大家终日关在剧场学习班里，每天除了要学习讨论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交代历史之外，不外乎是绣“忠字幡”（类似苏联电影中 1905 年“一九事件”东正教徒们游行时举着的长幡，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绣的是天主圣母的圣像，我们绣的是毛主席像），跳“忠字舞”。此外每日例行早请示、晚汇报，这令我想起小时候一早一晚要祷告。当然不敢说出来。

1969 年 4 月，与“八大”相隔十三年之久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九大”把林彪副主席作为法定接班人写进新党章。“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随着已经“完成造反任务”的红卫兵们被“伟大领袖”逼迫“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利用价值已尽的一大批文革初期曾经走红的、被中央文革支持过的“造反干部”（如山东的革委会主任王效禹、贵州的革委会主任李再含等）的命运，也逐渐走下坡路。四川省革委会的刘、张，自然在所难免。不久，就传达中央指示：他们“犯错误”了。

话说 1969 年 4 月“九大”前后，驻重庆市文化局的军代表靳参谋长，把全市文艺单位（所谓“八团三馆”）各自的“学习班”统一关到当时已经停课的重庆“煤矿工业学校”（简称“煤校”）举办，按照军队的编制，分为许多个大队（每个剧团为一个大队，歌舞剧团叫 41 大队），每个大队设立若干班。每个班十余人，正班长一人，副班长二人。表面上正班长由工宣队员担任，而副班长由领导指定两派各一人担任，事实上大权掌握在军人手中。在煤校学习班中，不但开展大批判，重新“清理阶级队伍”。不但“二牛鬼”要重新受到审查，两派“革命群众”也要互相算账，想法把对立面的群众打成“反革命”。

虽然在学习班里面很恐怖，但是每个星期六可以放假，有车接大家回团回家，这 24 小时是自由的。由于自从 1967 年在大礼堂表演小提琴独奏之后，两年来流传不少关于我的传奇故事，所以我在每个星期放假的时候，常常会被各个阶层的文艺爱好者们请去聚会，放松放松。每次聚会少不了要我表演一下，因而接触到了社会三教九流的人物。这点是文革前关在单位里不可能做到的。过了星期天，又有专车把大家运回煤校，继续搞运动。

我过了“清队”关

刘、张倒台后，“武装支泸”就不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是他们“支一派打一派”、“镇压革命群众”的“罪行”了。我自然也要重新被审查在“武装支泸”中的“罪行”。我猜想大概是参加过造反军宣传队的某人告诉了歌舞剧团中人，说我曾在“武装支泸前线”拿过枪，剧团中人就向工宣队反映了。这一下还得了，“阶级敌人”还拿枪！工宣队中 8·15 派的郑副队长直接气势汹汹地问我：“你究竟杀害我多少阶级兄弟？”非要把我整倒送公安局不可。

当时我在学习班 41 大队 9 班，分属两派的副班长一个是陈朵，一个是老黄。陈朵上面已经介绍过，这个老黄本来不但是我的广东同乡，而且是跟我同一届在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分到重庆歌舞剧团的同学，但是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在

另一派，所以总是带着有色眼镜，认为我是“阶级敌人”，“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趁机翻案”，非要把我重新打成什么“分子”而后快。还未到煤校时，我就亲眼看见他怀着“无产阶级义愤”，向着我们这一派的团里面的同事，满腔仇恨、脸红筋胀地喊着“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的口号，那个样子至今想起还十分震撼！

不久，就听说重庆话剧团已经有人自杀了。

我的事，作为一个乐队里的“重点”问题，自然要进行“内查外调”之后，才能作结论。要通过调查拿到我“没有杀人”的证明，就需要我提出能证明我“没有杀人”的名单，这样，我提出了涂安杰、李大成、“大甲甲”、“幺妹”、弋贤才、Z等几个熟人。我相信他们不会乱说乱咬，用当时的重庆俗话叫做“兄弟伙一四六九扎起”。

按规定，“内查外调”当然必须两个人一起（而且原则上应是不同观点的一派一个），派谁呢？马指导员派了两个副班长：陈朵和老黄。当定下“内查外调”的日子之后，就通知我连续三个星期在煤校“值班”不能回城，以免我和调查那几个人串通。殊不知陈朵在“内查外调”之前，早已经冒着烈日跑遍全重庆，和被调查的几个宣传队的队员暗中分别通了气。结果老黄听到的尽是我在宜宾如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如何“用毛泽东思想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如何热心做“好人好事”之类的材料，觉得不可想象，怎么这个“阶级敌人”这么好？

汇报上去之后，郑副队长也觉得“很不理解”：好容易捞到一条“大鲨鱼”，可以往上报“清理阶级队伍”有巨大成绩，好立功邀赏，怎么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这样，陈朵救了我一命。我过了“清队”关。

其实，我那个时候的思想确实是很“进步”的，不像现在这么“右倾”：从1963年到1967年，毛泽东的“雄文四卷”，我就通读了两遍，其中的一些重要文章（如“四篇哲学著作”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重要的段落都可以背下来，而且我当时确实是很真诚地信仰“毛泽东思想”的。这不是我自吹，我相信那些郑副队长们是绝对做不到的。

下半年，学习班搬到重庆大学。当时在41大队当工宣队领导的军人，已经由“徐歪嘴”换成较为温和的、另外部队派来的刘指导员。

有一天，刘指导员对陈朵说：“你们班的杨宝智，过去犯过错误，文化大革命中又犯错误，但是我们研究，杨是思想认识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我想把他作为挽救犯错误的人员的典型，落实政策，你看怎么样？”这说明事情已经搁平。1969年国庆二十周年大游行，我已跻身到能参加游行的“革命群众”队伍里了。

有一天，全体学习班学员出发到一个露天的阶梯型万人会场，听重庆市两派头头周家喻（省革委常委）、黄廉（市革委副主任）宣讲“消除派性、实行革命大联合”的现身说法。尽管他们按上级指示表演得很逼真，但，文革结束之后，他们都被抓进去坐了十几年的牢。

在重庆大学学习班，除了继续“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外。还要“解放干部”。这样，陈朵主持把1967年初搞“秋后算账”时被打倒的、以及被非党群

众“开除党籍”的孟少卿解放回来当乐队的领导。此后，“当官的还是当官，搬砖的还是搬砖”，成为众所周知的社会现实。按下不表。

乱世中的“闪婚”

从宜宾回重庆之后，由于Z家里离我们歌舞剧团很近，我和她经常（一有可能就）见面，开始有点像“耍朋友”（谈恋爱）了，但是她家里听到风声，不同意我们好，甚至她本人也没有勇气嫁给我——运动太恐怖，对她来说压力太大。后来一个寒夜在长江边上对我抱头痛哭一番后，她回平昌县去了。不久，她来信表示，结婚基本上没有可能。

1970年，重庆大学学习班解散。工宣队全部回厂“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回歌舞剧团后，领导我团的军代表改为张副政委外加对门军区转运站的马指导员。我作为“二牛鬼”，被分配在团里的工作，先是为演“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作芭蕾舞鞋，然后为《交响音乐沙家浜》抄谱。最后，由于钢琴已经多年失修，影响“样板戏”的排练工作，我就调去专门修钢琴和调音。自己单人独立工作，当然比跟大家一起钉芭蕾舞鞋、抄谱，来得自由自在。

下班之后自然在外面交友。时不时还在一些曾经是造反军宣传队和财贸9·21宣传队队员们的家里演奏，听众自然是他们的亲戚、朋友，和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之类。其中有一次，在钟锋家里，他的舅舅是抗战时从广东逃难来重庆的，后来一直在解放碑最著名的西餐馆“心心”当厨师，知道我是广东人后，同我用广东话交谈，还教我怎样做猪排：“先用刀背把剔骨的肉剁绒，然后再撒面包糠……”

那天晚上我拉完自编的“样板戏”片段和“红歌”之后，有人提出：“你们文艺界老是批判封资修，到底哪些音乐是封资修？可不可以拉给我们听听，让我们批判批判？”我想了一想，依次介绍了《阳关三叠》（封），《三套车》（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修）三首临时能想起来的、而大家又可以接受的东西。众人好久都没有听这些久违了的乐曲，当然高兴得很。我还得装模作样地批判一番，大家只是哈哈一笑。

夏天，在一位手风琴爱好者张宁的家中认识了小谢，她父亲原是一个空军医院的院长，三反五反的时候被“自杀”，母亲为丈夫申诉，终于在1958年戴上“右派”帽子。她本人结过一次婚，后来因故离了。她嫁给我的唯一条件是要一部钢琴。当年钢琴可是稀有物资，一般人不可能有。刚好在文革前夕，我们从我们乐队的同事冯叔镕手上，用180元买下了一部重庆乐器厂试造的、勉强可以弹得响的钢琴。

这样，我的“终身大事”就无需乎等到“2月30号”了，当年11月就和她结了婚，这个速度当时就算“闪婚”了。婚后适逢林彪“一号令”下来，我等“二牛鬼”全部要安排下放农村从事农业劳动，说是第一年可拿100%工资，第二年就只能拿80%，第三年拿60%，第四年要自食其力。

12月初，重庆市文化局所属的八团三馆全体几百个“下放”人员乘着十几

辆大卡车，在阴风惨惨的送别哭声中，向巴县接龙区小观公社出发。

突遭隔离审查

我被分配在一家离开公社还要背着行李走两小时石板路的农户（称为“住家户”）家中。公社干部向农民介绍我们时，一律称“下放干部”，未曾说我是“摘帽右派”。况且我们每个月要交粮票和伙食费给他们的，所以农民对我不错，很客气，比在团里面和以前各次下乡劳动时，相对要友好、平等得多，称呼我“杨同志”。所以我和住家户关系也很不错，生活倒还平静，干农活时也受到照顾，时刻嘱咐我“量力而行”，所以不算太艰苦。缺点是没带乐器下来，精神比较空虚。

过了三个星期，大概是相当于圣诞节前夕，突然来通知说叫我把所有东西收拾好，要到公社去，通知的人神色很严肃，而且派了同是“摘帽右派”的演员白乐安帮我拿一部分东西。我们边走边分析，也不知道去干什么。到了公社，我还不知趣地给正在排新年节目的下放干部演员队负责人李平去提点音乐上的建议，她轻蔑地对我摆一下手，示意我“靠边站”！连话都懒得对我说。

然后马上由歌舞剧团革委会派来的二人：不久前还找我教过他两个儿子小提琴的著名诗人梁上泉和舞台美术队搞灯光的工人、共产党员、号称“大灯泡”的万太华，将我押解上一辆货车，说：“从现在开始，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我问：“到底什么事？”他们说：“你自己知道。”我从来没有见过比梁大诗人此时更加凝重如铁的脸。

这样，他们坐车头司机旁，我坐在货车箱的地板上，垫着自己打的背包。寒风吹，车颠簸，八小时后，才到了团里，然后宣布对我进行“隔离审查”。由老黄、万太华和刚从四川音乐学院毕业的、号称“老贫农”的王发顺对我24小时轮流监管，用老黄所住的房间，加了一张床，作为我的“禁闭室”。

老黄说：“你有重大问题没有交代。清队学习班都给你滑过去了，哼！”

我问：“什么问题？”

他们就甩出一句话：“你自己知道！”

他们每天的任务就是不断动员我“老实交代”。叫我每天写交代材料往上报。然后每隔两天，张副政委和马指导员就找我谈话，要我交代“自己知道”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最初我想到一定有人陷害我，是谁呢？我想可能是小谢的前夫，也是造反军的，歌舞剧团背后官井巷铁工厂的工人管大汉。材料交上去，张副政委打回来说，“不是！不老实。”我又想，是夏天在我之前正在追求小谢的一位也姓谢的青年陷害我。材料交上去，张副政委又照样打回来说：“不是！态度不端正。”这样，依次怀疑曾经和小谢好过的和平电影院的美工张眼镜、南岸塑料厂的老范，都被否认回来。张副政委说：“我们是苦口婆心地挽救你，你怎么脑子不开窍呢？痛痛快快！‘竹筒倒豆子’！剩的时间不多了。刚才你看到公安局的人来了吧？你再

不好好交代就不是在这里呆了。”

有天老黄说：“看在老同学份上，带你看看布告启发启发。”这是一张公安局贴的破获一个“地下俱乐部”，犯人皆判死刑的布告。我看完之后，居然觉得和我毫无关系。我说：“启发不出来。”他很失望。

张副政委又反复动员我“为你自己本人的前途、利益好好考虑”（他把‘自己本人’四个字用重音）。我说：“党不是一贯教导我们要考虑党和人民的利益、要‘斗私批修’吗？怎么你现在又要我考虑自己本人利益呢？”他瞪眼说：“你没资格‘考虑党和人民的利益’！”

天哪！我想来想去，实在想不起有什么问题，终日茶饭不思，十分郁闷。老黄又说我：“不要装死狗，这样下去没有好下场，公安局的人刚才又来了，你还不争取主动？”

经不起他们几番恐吓，我觉得只有一死了之。但自杀也不容易，黄某他们二十四小时包括大小便都跟着。因为那时全团只有一个在第一排练场旁边的公共厕所，从关我的“禁闭室”到那里去要下三层楼、还经过大操场，他们考虑这个过程中我会接触群众，会请人通风报信，所以要跟着。

触电吗？六只眼睛看着。不可能。

这时，市歌舞剧团在演出样板戏舞剧《红色娘子军》，每天晚上老黄、万太华都要打灯光，于是由要参加唱合唱的“老贫农”王发顺把我带到后台，告诉大家，这是“要犯”，让“群众监管”。后台的所有人我都认得，但是没有一个人敢搭理我。1958至1961年我还没有“摘帽”的年代，还有几个人跟我说话，如今我坐在那里，人们在我前面走过来走过去，只当我是一根木桩，视而不见，最多拿眼角瞟我一眼。也是，人家说什么呢？“你是不是反革命呀？”

公厕耳语让我如释重负

但是百密难免一疏。1971年元旦的次日，我上厕所解大便，老黄虽然跟着，但没进去，只在离厕所十米外抽烟，准备等我出来再押回去。意想不到的陈朵来蹲在我旁边的坑，轻轻地问我：“你知道你是什么问题不？”

我说：“我根本不知道，他们硬说我知道，太痛苦了，我想死。”

“千万别！我打听到他们说你是一个‘地下俱乐部’的问题，有没有？”

“我哪里有这种事嘛。”

“如果没有，就坚决不要承认！”

我们的对话几乎是耳语，老黄在外面根本听不到。

我完全放下了心：这显然是一宗莫须有的冤案！

这个元旦假期真是过得太有意义了！陈朵又一次把我从死神旁边拉回来了。

自从公共厕所见过陈朵后，我情绪十分轻松，一下子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回到老黄住处，看见他书架上摆得有“样板戏”《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总谱，趁他到走廊抽烟时，我就翻来看，抓紧时间学学吴祖强和杜鸣心等老师的配器高招。“大胆！不好好交代问题还看我的总谱？上次叫你看公安局贴的布告那个问

题考虑得怎么样啦？”他发现了冲过来吼道。

我心里有底了：“你说的是‘地下俱乐部’的事啊？”我用《智取威虎山》里栾平的腔调继续说：“有四十几处哇！”“马上交代！”

我拿过他递来的笔和纸，把最近两年所有朋友聚会时拉过琴以及教过琴的场地，都一一写下来：

- 1、梁上泉家里。俱乐部主任：梁上泉。（他曾经请我去教他儿子学小提琴。）
- 2、重庆大学学习班九班教室。俱乐部主任：班长黄某。
- 3、《8·15 风暴》首席小提琴、老黄的朋友焦亚虎家里。

.....

他气愤得咬牙：“狗以（日）的！”（他虽然来了重庆十四年，但是讲四川话，哪怕是骂人的粗话，都还没有脱离广东话发音）拿去上交了。

我这天晚上是从被农村押回团以来第一回睡了个好觉。

原来是追查“230 兵团”

第二天，张副政委传令找我去谈话：“你以为你在人家那里拉拉‘胡琴’（政委虽然见过大家排练，但没听说过何谓‘小提琴’），我们就把你弄回来审查吗？”

“我想是的。我想不出别的原因。”

“那个叫钟万玉、又叫钟锋的人，他的舅舅是什么人？”

“广东人。”

“啪”的一声，张副政委大拍桌子，吓得我说话只能断断续续地：“心心……心心……心心的西餐厨师，猪排做得很好。”

“谁问你这个？你和他之间有什么反革命勾当？”

“没……没有。”

“不老实！……加温！”他跟马指导员说。

过两三天后的一个寒夜，乐队在练乐室开我的斗争会，旁边生了个火盆。不知为何，批判的都是“武装支沪”的事，唯独不提“地下俱乐部”。你一言我一语，包括“元头”，都属表态性质，表示跟我划清界限。唯独李懋绩轻描淡写好心地说了句：“主要要从路线上看。”

第二天早晨，张副政委把我找去：“别的不多说，你跟我交代‘230 兵团’的问题。交代清楚就放你走。”

我说：“搞了半天是这个事啊？那是我们在宜宾的时候几个宣传队员吃完饭开的玩笑。”

“玩笑？你们没有打算拉起一个兵团在重庆綦江和贵州之间的大山打游击？据说你还是兵团司令？”

我笑道：“你看像吗？”

他皱起眉头想了半天：“这件事情你要老老实实交代！先回去吧！”

我回去把当年的情况写了不到半张纸交上去了，因为实在是太简单了，没有多的好写。幸好当年我的档案上光写不好的方面，没有写 1956 年中央音乐学院

派我去学射击，回到学校又当射击教练的光荣事迹。如果有，“上山打游击”一事可能跑不掉了。

自此之后，监管气氛似乎松了些。王发顺来说：“你在生活上有什么要求，可以跟我说。”一副优待俘虏的口气。我提出理发、洗澡等等，起码可以上街走走，呼吸一下别样的空气了。

除夕，团里给大家聚餐，普通人可以在食堂领几个菜，我只能领到一份炸带鱼，还算是特别恩赐。这份带鱼炸得很透，吃起来脆蹦蹦的，很开胃，吃完了还不够，还想吃，没有了。这时候，王发顺走来说：“过年了你需要家属给你带点什么吃的？”我说：“炸带鱼。”过两天，我收到他转来的小谢送来的她堂哥哥做的带鱼（当然很感谢，但是略微有点遗憾，因为不是食堂那种脆的，而是红烧的）。有传闻说王发顺偷吃了一部分，我看不见得，他那些过节“打牙祭”的东西还未吃完。还有人杜撰说“带鱼里面藏了一张纸条”，把我“从精神崩溃想自杀的边缘挽救过来”了。且不说元月2日陈朵在公共厕所的谈话根本转变了我的精神状态，就说过年前“禁闭室”窗口吹的“祥风”也够使人神清气爽的了：

原来，关我的“禁闭室”（老黄的房间）旁边是我们乐队拉手风琴的“小甲甲”的寝室。过年前几天的一个上午，监管我的人都不在，“小甲甲”的哥哥、当年造反军宣传队的二号勤务员“大甲甲”，经过老黄的窗口，他问我：“为什么在这里？”我把情况讲了一下。他说：“拉板胡那个钟锋，不知道什么案子，被关进局子里，随便说什么都说他没交代彻底，他只有把‘230兵团’的事编个故事来说，这样，宣传队其他几个人都被理抹（注：川语，审查、收拾之意。）了一下，因为确实就是一句玩笑，查不下去。好像除了他，其他人都放出来了。”

这之后，我心里就更有谱了，再也想不到自杀了。自然也未曾想到九年之后的春节，居然还能在重庆人民剧场成功地开我的首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小提琴独奏音乐会，此为后话。

至于老黄，四十五年之后，在重庆江北一个住满了文艺界退休人员的“天邻风景”小区碰到他，当然，一笑泯恩仇，都付笑谈中，大家像没有事一样交流交流近二三十年的作品（得失、感想之类），谁也不去触动那“230兵团”的事。

了犹未了

春节后，我到食堂打饭也无人紧跟了，只是被远远地、走过场地“监视”着。

有一天，陈朵找到适当的时机和我耳语：“最近要开个全团的批判会，这是他们给自己下台阶的动作，好证明他们‘一贯正确’。开头自以为抓到条‘大鲨鱼’，搞了半天又没‘搞到着’（达到目的），实际上就是结案了。你要有思想准备，随便他们说什么，你都不还嘴，事情就过去了。他们叫我上去发言，我拒绝了，本来搞错了嘛，‘莫须有’的事情，说什么呢？”

有趣的是，开批判会的前一天晚上，我们乐队吹圆号的、四川音乐学院1964届毕业生，也是我们“血战纵队”成员的喻钟弘君，趁“看守”不在，走进关我的“禁闭室”说：“杨宝啊（亲近者都这样不称全名），刚刚接到通知，要我明天

上台批判你，说你到处‘宣扬封、资、修，毒害青少年’。我不知道讲什么好，你是不是提供点材料，要不然我交不了差呀！”

我想了一下，于是乎就告诉他：“封建主义，你就说我拉过《阳关三叠》，词是根据唐朝的诗人王维写的《送元二使安西》发展的，当然是抒发封建士大夫的感情的啦；资本主义，就说拉过《三套车》，旧俄时代的歌曲，列宁以前的当然是资本主义啦；修正主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够不够修？怎么样？”

他连忙说：“行了行了！谢谢你！谢谢你！我这就回去开个夜车写发言稿。”

第二天开大会由革委会主任李光亨主持。给了我张椅子在他面前坐，先定了调子说我是条“哈巴狗”（这个调不算低也不算高），然后叫我“好好接受大家批判教育”。既然是为他们下台阶的“批判会”，大家都在念稿子、演戏，由于调子定得不是很高，喊的口号还算温和。只是我们乐队吹双簧管的小范突然冒出一句：“打倒杨宝智的反革命气焰！”比大家高了一个增四度，不大协调。所以，所有其他人当时喊的口号我都忘记了，唯独他的声音和表情现在印象还历历在目。

大会开完了，自然过两天就该回乡下了。返乡前开恩放一天假回家看看，就得赶到巴县接龙小观公社报到了。这次分到大同大队，住家户是另一家“贫下中农”。这次我带了个手风琴下去，农业劳动也表现得不错，干活时肯甩开膀子，还带了理发工具，给“贫下中农”剃头，受到不少农民赞扬。不久，文化局的党委书记苏老太婆苏里“下来看望大家”。见到我时对我说：“杨宝智，你的事还没有完，你要继续老老实实接受大家监督。帽子掌握在人民手里，随时可以给你戴上！”

乡下有不少趣事：例如法国留学生、我们老广、声乐专家、“特嫌分子”薛传懿从乡民那里拿到一条蛇身（他们把头砍了、胆吃掉了），我们两人弄熟了，还是吃得很愉快，苦中作乐嘛。

转眼就到端午节，突然又接到通知叫我收拾所有东西回单位报到！

这该不是又是什么案件吧？当时抓“5·16”正起劲，但是大家分析我不够格。好在没有谁谁来押我回去，而是行动自由——“自便”。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离开公社，住家户依依不舍地包了些粽子叫我带回去。回到家，众人曰：除“四旧”后，久违此“端午节”矣！

次日回单位，才知是革委会要抓“基本功训练”，钢琴又不准了，琴键也起不来了，要我修理和调音！原来如此。拿调音扳手当然是要比拿锄头轻些。

国庆前后，过去跟我学过小提琴的学生张子扬突然闪进家里来说：“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林副主席跑了……”

我愕然，他补充道：“而且死了！”

听得我一时懵了。看见我没有反应过来，他讲了个大概，说文件目前只传达到省军级。

刚巧，收到江瑞成写来问我有关小提琴练习的信，他这时在宜宾军分区支左办公室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作，我回信问他，他很快答复：确有其事。

不久，下放干部全体回城，次日在团部会议室集合。梁上泉的夫人蒲心玉对

大家宣布：“现在大家听中央文件的传达报告，杨宝智不能参加听，你的事没完！”

我说：“不外乎是林彪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的事嘛！我早就知道了，不听也罢。”

众人大惊。他们在下面什么都被蒙在鼓里。还以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党章规定的林副主席还“永远健康”着哩！

随着林彪系统的黄、吴、李、邱四大金刚受审查，四川的梁兴初也跟着倒台。不久，张国华逝世。那首载歌载舞的《张梁刘张来四川》的“红歌”歌声还在耳边响着，四个人就没了。但是我的“230兵团”一案，从苏老太婆和蒲心玉说“没完”至今，也没有谁给我说个“幺二三”。真所谓“天下事了犹未了、不如不了了之！”

如今，事隔几十年，回到香港闲来无事，把这些奇事写出来，供有心人茶余饭后消遣消遣，莞尔一笑吧。

不过现在看起来，不少那个年代的名词都要加一长串注解，否则现代人很难看懂。一般香港人是看不懂的啦。

2013年3月

【蓦然回首】

一生难忘的血火记忆

刘国平

按：本篇摘录自作者的回忆录《朝事暮想集》（自印书）。现标题是另拟的。作者当时是四川省万县市（今重庆市万州区）第三中学高三学生。

“六三”事件（1967年6月3日万县市中学生造反派到公安局请愿遭到突然袭击造成死伤数十人的惨案）后，万州两派的对立更加尖锐，初期的低级武斗开始出现。先是双方辩论时指指戳戳，拳脚相加。后来，就头戴安全帽，身带木棒、钢钎参加所谓的辩论，开始进行“文攻武卫”了。那时，保守派的装备较好，街上常见一队队头戴藤帽，手执钢钎的队伍，行色匆匆地一掠而过。那便是当时万州保守派中有名的“藤帽队”、“钢骑兵”、“钢八连”等准武斗组织。

为了扩充势力，保守派还从农村调来大量农民，凭借人多势众，将造反派压缩到万州上半城区。在这块狭小的地方，造反派只剩下包括我们学校（万县市第三中学）在内的几个孤零零的据点。我校教学大楼的底层，除了留出窄窄的通道外，全都用桌凳堵得严严实实，并设置了路障。驻守楼房的，不光有本校的造反派学生，还有其他单位的造反派。因为他们单位被保守派占领，只好到这些据点来寻求保护和开展斗争。

大规模的武斗从掷石块，扔砖头开始。万州的高笋塘到地委大门口这一带，便是这种武斗的主战场。在这一百来米的公路上，双方列队对峙。队伍前面的人，

一手拿着棍棒、钢钎之类的进攻武器，另一手则拿着木板之类的防护物。对峙不久，只见一方突然向另一方发起冲击，另一方就哗的一下纷纷后撤，进攻方也不敢贸然远进，二三十米后，就停止了追击。不一会，后退的一方发起反击，先前进攻的一方又哗的一下后退。就这样，你进我退，我进你退，如同涨潮退潮的波浪一般，但双方始终保持着一段距离，尽量避免用木棒、钢钎直接厮杀。

这时候，最有效的进攻手段便是向对方投掷砖头石块。在队伍中，你得时时提防从天飞来的砖石。也有不小心被砸伤的，但马上会有人扶他去包扎。进攻的砖石不够怎么办？造反派这边，倒有许多“支前”人员，主要是一些不便冲锋陷阵的老头、妇女或初中学生。他们将捶成小块的砖石，用筐子、撮箕等工具运送到队伍前面，为那些阵前英勇作战的人员提供“弹药”。那一阵子，高笋塘地面上砖石遍地，临街的房屋，几乎片瓦无存，因为瓦片是最方便的进攻武器。可是，光用手臂投掷砖石瓦片，距离很短，威力也不大。于是，有人想出了新招。就是将长板凳翻过来，截去一腿，在剩下的另一腿上绑上较粗的橡皮筋，这个放大的弹弓，如同一门土炮，用它包住石块，弹射到对方阵中，杀伤力大大提高。一时间，板凳弹弓盛行，不少人吃了它的苦头。

很快，武斗升级。双方从身体不接触的投掷砖石瓦块，变成手执钢钎，近体厮杀的肉搏。高笋塘附近的街头和屋顶，成了激烈厮杀的战场。我那时胆小，不敢手执钢钎上阵厮杀，但见过双方惨烈拼杀的场面。我曾亲眼见过一位同学，手执钢钎与对手在屋顶厮杀。对手被我那同学一钢钎刺中，翻身跌落屋下……在双方激烈的拼杀中，不知有多少人命丧黄泉。

不管战斗多么惨烈，这时的武斗毕竟还处于冷兵器阶段。随着武斗的加剧，武器也在升级，有人开始使用手枪、小口径步枪（射击运动用枪）一类的热兵器。随即，热兵器武斗升级泛滥。应该说，这与军队介入文革，各支持一派有很大关系。那时，驻守万州的野战军 7799 部队支持造反派，而地方上的军分区、武装部却支持保守派。野战军装备好，来头大，地方武装部关系广，根子深，双方各有后台，谁也不服谁。两派的武器，大抵通过明抢暗送得到。支持一派的军队，先向本派头头透露枪支弹药的存放地点，头头们随即组织人员去抢夺，军队则睁只眼闭只眼，任由他们将大批枪支弹药“抢”出去。在军队的暗中支持下，两派迅速武装自己，加强了武斗升级的军事装备。

在此前后，两派还为武斗作了充分的舆论准备。双方开动机器，大造舆论，都指责对方狗急跳墙，要使用武力来达到目的。因此，武装自己进行“文攻武卫”，似乎就是天经地义的了。

就在这时，发生了举世震惊的武汉“七二〇事件”，揪“军内一小撮”，抓“带枪的刘邓陶”很快在全国盛行。军内的斗争反映到地方上，就是野战军和地方武装部各支持一派，他们或暗中出谋划策，或公然披挂上阵，支持本派进行大规模的武斗，试图以武力消灭对方。短短几个月，万州就发生了多次武斗。

造反派“抢”到枪支弹药后，迅即分发下去，将有枪的工人、学生混合编队，组成战斗队伍。我那时也顺应大势，“投笔从戎”，很少“文攻”而去“武卫”了。

我和战斗队的一些人员被编入一个独立排，排里还有其他学校的学生，但以万县通用厂的工人为主。独立排下辖三个班，班长全由我们学生担任，我是其中之一。排长是通用厂一位姓张的工人。张排长的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多少，是一个铁杆造反派，在万州的“二月镇反”中，被打成反革命而坐过牢，在后来的武斗中，作战十分英勇。那时，发到造反派手中的枪支，多是“三八大盖”，一般的工人和学生不仅毫无战斗经验，连枪支的基本使用知识也缺乏。高中学生在校时虽然进行过军训，摸过步枪，但没有实弹射击。很多人对战斗的残酷性认识不足，有的甚至是抱着好奇的心态参加武斗队的。但随之而来的战斗，给了人们残酷的现实和深刻的教训。

独立排刚刚组建，就迎来了关塘口之战。

关塘口地处万州城郊，它对面有个小山包，小山包与市区隔条小河，河水很浅。在我们排到达关塘口时，前面的队伍已经发起进攻。一阵激烈的枪声过后，我们跟着前面的队伍徒步涉过河去，并向小山包冲击。很快，我们就冲上了小山包。小山包中间有一条小街，街上还弥漫着硝烟，对方已经溃逃。这时，我看到一个被枪弹击中大腿的对方武斗人员，年龄在三十岁左右，正趴在地上，鲜血流了一地。他绝望地向我方人员叫道：你们把我打死！你们把我打死！但没有谁去理会他。他拖着受伤的大腿，艰难地挪到不远处的小水沟边，水沟里还有前天下雨存留的少量积水，那水已经很脏。但见他不顾一切，趴在小水沟边，大口大口地喝起来。后来听说，在他喝水后不久，就死去了。据说，受伤后流血过多的人，一定不能大量喝水，否则，很快就会丧命，不知是不是这样。这是我在武斗战场上亲眼见到的第一个死者，给了我极大的震撼。

在小山包边上，我们趴在路边，朝着对方逃走的方向，胡乱地打了几枪，呆了约莫半个小时，又继续前进。前进的路上，有一片开阔地，路边是一块大田，田里种着莲藕，荷叶像一把把小伞直立着，足有半人高。就我们通过开阔地时，忽然，子弹嗖嗖地从对面打来，在身边溅起一团团泥土。“哎呀！”一个姓李的同学尖叫了一声，他的脚趾被击中了，好在是轻伤。那子弹仍然不停地飞来，我们顾不得其他，赶紧跳进藕田里趴下，利用荷叶作掩护，才躲过了身遭枪击的危险。过了好一阵，枪声停了下来，我们才试探着从藕田里钻出来，身上都被荷叶的茎干划出了一道道血红的长印，难受极了。但我们仍然心有余悸，并庆幸多亏这片荷叶作掩护，不然，我们的性命也许难保。就这样，我们经历了第一次实战。

过不多久，我们去攻击万州郊区龙宝山的一个据点，采取晚上偷袭的战术。半夜时分，我们悄悄地摸到对方阵地，并小心翼翼地靠近对方。忽然，对方一声大喝：“口令？”我一愣，随即顺口随便回答了一句，并迅速趴下，做好战斗准备。谁知对方竟然说我的回答不对，口令应该是“菜籽、棉花”。我们一面含糊应对，一面蜂拥而上，抓获了对方的哨兵。原来是一个农民，没有一点站岗放哨、使枪打仗的经验。接着，我们乘胜进击，对方溃逃。我们没发一枪一弹，就轻易地拿下了这个据点。后来，同学们夸我能急中生智，善于打仗。其实，我不过是情急之下随口应答罢了。

说到万州文革时期的武斗，最激烈的大约要数电报路小学和专区医院二门诊部的两次战斗了。

电报路小学的那次武斗我们没有参加，听说双方激战大半天，死伤不少。其中，就有我国著名短跑运动员陈家全的小弟弟。他是通用厂的工人，他们厂的造反派被保守派撵出来后，住进了我们学校的据点。小伙子个头不高，身体壮实。住在学校期间，和我们打过篮球。他惊人的弹跳力和出众的体能，让我十分佩服。可是，谁能料到，体格健硕的他，竟在武斗中丧了生。

二门诊部激烈的武斗我倒是亲历了。当时，万州的造反派在有利的大气候和野战军 7799 部队的大力支持下，不断扩充势力范围，而保守派则步步退守，二门诊部是他们在主城区固守的最后一个据点。拿下二门诊部，保守派在主城区就将失去立足之点，因此，造反派对攻打二门诊部非常重视。

造反派的武斗副总指挥刘银生亲临一线指挥。刘副总指挥瘦瘦的身材，长长的脸，当过几年兵，是个小军官，后来转业到地方工作，参加了造反派。万州“二月镇反”时，他也被关进了监狱，听说表现得很坚强。他擅长打仗，造反派的多次武斗就是他指挥的。

二门诊部地处万州的西山路，它后面是坡度较陡的蔡家坡。蔡家坡生长着杂乱的树木，下面是密密麻麻的民房，民房外面是一条小街，小街的对面是二门诊部的围墙，围墙里的大楼，便是对方固守的据点。那天，天刚麻麻亮，我们几队人马就悄悄地来到蔡家坡，凭借树木、房屋的掩护，分别进入各自的阵地。我排的多数人员，在张排长的带领下去到二门诊部的右边。我方的大队人马，也布置在那一线，刘副总指挥就在那边指挥。我和几个同学，慢慢地摸到了二门诊部左面的一个四合院里。四合院的居民早已撤走，房子里空荡荡的，透过临街的窗口，可以隐隐约约地观察到对面大楼的一些情况。

就在我们进入到四合院不久，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交火。我方人员在刘副总指挥的带领下，打算强行冲过小街，攻占大楼，但遭到对方猛烈火力的还击。几名进攻人员倒在了小街丁字路口的血泊中，其中就有刘副总指挥，还有两名准备前去救治伤者的女卫生员。这使我们非常震惊，很想从路口将他们拖回来，看还能不能救治。

这时，不知从哪儿过来一位年轻工人，手拿步枪，在四合院的台阶上，躬着身，一边走，一边回头对躲在院里的我们说：快找竹竿和绳子！话音刚落，就被对方射来的子弹击中，只见他的身体在台阶上旋转了大半圈后，一下子倒在了地上。这一下，我们谁也不敢迈出屋外，全都躲在屋里，从小小的窗口伸出枪去胡乱还击。那一阵子枪声大作，震耳欲聋，有子弹尖利的呼啸声，有树枝被打断的吱吱声。平常说过枪林弹雨，那会儿倒有了真实感受，不过却有些恐怖。

又过了一阵，枪声稀疏下来。我的一位张同学说，要出去小便。张同学幼年丧父，家境贫寒，靠老母亲一手拉扯，好不容易才上了高中。他平常沉默寡言，人很本分，虽然参加了造反派，但从没参加过武斗。鬼使神差，攻打二门诊部的那天早上，他非要跟着我们不可，说是要去看看武斗的热闹场面。在枪声大作时，

他似乎有点害怕，后悔不该来到武斗的前沿阵地。听说他要出去小便，我和几个同学便劝他，不要出屋去，就在屋子里小便算了。可是他不听，坚持要到屋外小便。我们只好陪着他，来到院子后面的屋檐下，这里与二门诊部的大楼并没有直接相对，后面的蔡家坡高地又是我方控制，应该比较安全。谁知张同学小便刚完，正准备进屋，就从后面飞来一弹。子弹从他的前额打进，后脑钻出。他连叫也没叫一声，就倒了下去。我赶紧抱起他进到屋里，只见他头顶脑浆直冒，足有好几寸高。尽管我们急切地大声呼唤，不停地摇晃他的身体，但他却没有丝毫反应，很快就断气了。那一刻，我们又急又怕，担心在对方强大的火力封锁下，我们撤不出战场，张同学的尸体运不回去，如何向他年迈的母亲交代。

事后，我仔细想了想，张同学所中之弹，不大可能是对方射过来的，因为子弹的来向不同，极有可能是我后方人员胡乱放枪所为，但却无从追查。张同学只好和在“六三事件”中的另一位张同学，一同作了无辜的冤鬼。武斗结束后不久，在我队刊印的《千钧棒战报》上，我们还特地编发了一篇悼念张同学的文章，以寄托全队对他的哀思。后来，两位遇难的张同学，都曾葬在西山公园上面的烈士陵园，再后来，坟墓被迁。现在葬于何处，我不得而知。但愿二位同学在新的墓地里安息吧。

直到中午时分，枪声才停下来，大约是对方撤出了战斗。我们不敢贸然进攻，也撤退到稍后一点的地方休息。大家又累又怕，一脸沮丧，无心吃饭。这时，听说我方所有死者已运回后方，我又想起了无辜饮弹的张同学，心情十分沉重。随后传来消息，说张同学的尸体已被他当工人的哥哥领走，我们才稍觉心安。

就在我们休息期间，我看到时称九号首长的 7799 部队的副参谋长，身着便衣，带着两名便衣战士，在悄悄地查看二门诊部周围的地形。

造反派损兵折将也没能拿下二门诊部，当然不甘心，我们又接到了晚上继续战斗的命令。大约晚上九点多钟，我们趁着夜色，摸到了二门诊部的围墙外面，大家静静地埋伏着。忽然，轰轰几声巨响，好像大地要被掀翻一样，二门诊部的围墙被炸出了一大段缺口。后来听说，是 7799 部队的九号首长看了地形，选了爆破点，派便衣战士去爆破的。

我方埋伏人员随即顺着炸开的缺口，摸进大楼。大楼里黑洞洞的，过道上堆着许多桌椅，可能是用来作路障的。我们摸到过道前面，见我排几名人员正打着手电筒，在帮一个人修理机枪。那人头戴钢盔，只抬头看了我们一眼，啥也没说，趁我们不注意，提着刚修好的机枪，在夜色中溜走了。很快，在黑暗中传来对方的机枪声，我们赶忙还击。这时，我们才回过神来：原来那人是对方留下的狙击手！胆量倒够大的，也很镇静。要不是机枪出了点故障，我们摸进过道的人，很多都要成为他的枪下之鬼了！想到这里，大家不禁惊出一身冷汗，同时，又感到庆幸。枪声很快停下来了，因为双方都在暗处，大约那人知道我们已经发觉他势孤力单，因此不敢恋战，已经撤退，而我们也不敢在黑暗中冒失地追击。

二门诊部被攻下后，造反派就控制了长江北岸的万州主城。保守派退到江南，作最后挣扎。不久，造反派发起了向保守派的总攻。

八月中旬的一天凌晨，我们乘船渡过长江，在江南的晒网坝登岸，沿着山路，向毡帽山进攻。毡帽山山顶现在已被推平，修建成了万州机场，有公路直达。但那时上山，却只有一条不宽的石板小路，坡度较大，爬上山去比较困难。我的一位刘同学，也是班长，作战一向勇敢，体力又好，全排只有他挎着冲锋枪。他带领几名同学冲在前面。一路上不时听到他的冲锋枪在哒哒哒地开火。我们没有遇到多大抵抗，很快就占领了毡帽山。当时只抓到了对方几名逃散人员，其中一个是对方的头目，我方几名队员把他押到山后，搞了一次假枪毙，据说将那人吓坏了，但我却没有看到。

从毡帽山下来后，造反派开始沿万利公路（万州至湖北利川）追击，一直追到与鄂西接界的龙驹、白土两个乡场。沿途没有遇到抵抗，不时见到造反派往回押送“俘虏”，那是被抓到的对方逃散人员。很快，我们排从前方撤回解散，学生回校，工人返厂，但枪支尚未上交。自此，万州城区文革期间的大规模武斗基本结束。（上图：武斗结束后，独立排部分人员合影，后排左二为作者。）



回望往昔，在我们这片动荡的土地上，屡见大动干戈的武力纷争，却绝少和平嬗变的权力更迭。文革中的大规模武斗，或许与此传统一脉相承吧。但愿未来文明的演进，能够改写这种用武器批判来代替批判武器的铁血历史。

【故纸堆】

我初步坦白交待反动组织“三老会”的罪行

程占彪

按：1967年，毛泽东及其“无产阶级司令部”将在四川省主政多年的李井泉、廖志高等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宣布打倒。四川省在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中蒙冤受屈的一些老红军、老干部、老地下党员便纷纷起来控诉受到“李廖死党”迫害的情况，要求平反。然而，“无产阶级司令部”却认定这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右倾翻案”，1968年3月15日中央首长接见四川军政领导人，听到汇报有关“三老会”等“反动组织”情况时，周恩来、江青严厉表态说：“反动得很，要坚决镇压。当然要区别对待。组织要解散，核心成员一定要专政。”

（在当年四川省按照省革筹组组长、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的记录正式传达的中央首长“三一五”指示中，这段话就是“总理、江青”两人一起说的。因此四川省贯彻这一指示时就不好说是“总理指示”或“江青同志指示”而只好笼统说是“中央首长指示”。）于是，在全国清查“五一六”的高潮中，四川开展了一场独具特色的“批清”（又叫一批双清，即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三老会”）运动，其重点就在清查“三老会”。所谓“三老会”，无论是整人者还是被整者都始终无人说清楚这个组织的真正名称是什么，实际上这是个并不存在的“反动组织”，不过“三老”的概念是明确的，就是指那些在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过错误处理的老红军、老干部、老地下党员。在清查“三老会”运动中，1933年投身革命的老红军程占彪，不知经过怎样的开导，交出了自诬诬人的“坦白交待”，当时他的这个“坦白交待”在四川全省大量印发，组织学习，他的交待录音还在全省许多地方的有线广播中反复播放，几乎是家喻户晓，起到了十分重要的“现身说法”作用，影响极大。重新公布这篇奇文，不是为了追究某人的个人责任，而是为了让人们看看这样一场“大革命”把一个曾经为革命流血奋斗的老红军的人格和心理扭曲到了何等地步，而那些冤案炮制者们又荒唐可笑到了何等地步。

我叫程占彪，是臭名昭著的反动组织“三老会”的头目。我是一个屡犯严重错误的蜕化变质分子。由于我长期对党不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披着所谓“受迫害”的外衣，打着“造反”的旗号，趁机翻自己的案，勾结了一批牛鬼蛇神，大造无产阶级的反，大搞右倾翻案，大搞篡权复辟活动。为了达到这个反革命目的，“三老会”同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刘、张（注：指曾由中央任命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的刘结挺和张西挺夫妇，二人已经在1969年底被中央抛出作为造成四川动乱、落后的祸首严加批判）互相勾结，互相利用，我们利用刘、张进行翻案复辟活动，刘、张利用“三老会”为他营造“独立王国”，复辟资本主义。“三老会”在刘、张的直接支持、重用和包庇下，干了大量的反革命活动，破坏全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罪恶累累，我们罪该万死！

我和“三老会”成员王豪、刘风勃在这里向人民低头认罪！向毛主席革命路线缴械投降！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请罪，向党中央请罪，向四川七千万军民认罪，向广大革命群众认罪。我要彻底坦白交待自己的反革命罪行，今天我初步交待两个问题：

- 一、反动组织“三老会”的组织、纲领和主要罪行。
- 二、个人野心家刘、张如何支持、重用和包庇“三老会”。

第一个问题，反动组织“三老会”的组织、纲领和主要罪行。

（1）反动组织“三老会”的组织概况

反动组织“三老会”是一九六七年五月由特务、旧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井泉黑同伙杜心源，旧省人委副省长张呼晨，叛徒米建书（注：成都市委书记兼市长）、

郭辅仁（注：原成都市总工会副主席）、王际康（注：原四川省经委副主任，1968年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刘正唐，叛徒、右派杜孚生，马骏阳等一伙人为首搞起来的。所谓老红军、老地下党员、老干部，实际上是一批老叛徒、老特务、老右派分子、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走资派、四清下台干部，以及历次政治运动有严重错误受过批判处分的人。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三老会”就是这样一个由李廖死党的同伙和一伙反革命操纵搞翻案复辟活动的地下秘密组织，一个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独立王国。“三老会”开始是由“三老会”发起人、核心领导成员杜心源、张呼晨、米建书、郭辅仁、刘正唐等五人领导“囚干团”（注：成都地区1967年“二月镇反”中被捕后获释的一些干部要求彻底平反组建的“红囚徒革命干部战斗团”）总部作为公开组织起来掩护的。“三老会”在公交系统、文教系统、财贸系统、成都市设有分支机构，公开以干部造反组织的面目出现，掩护“三老会”活动。

反动组织“三老会”曾经策划以“囚干团”来统一全省的所谓干部“造反”组织。后来，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中旬，由于张政委（注：指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点了“囚干团”，讲了“囚干团”要解散，张政委一点，惊动了我们，凭着我们的反革命敏感，觉得情况不妙，便策划采取了紧急的隐蔽措施：一、把“红囚徒”（注：成都地区1967年“二月镇反”中被捕后获释的部分人员组建的“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总部红囚徒”）总部搬到永兴巷原招待所；二、杜心源、米建书等人退居幕后，不再公开活动；三、取消“囚干团”的牌子，掩人耳目。这样，“囚干团”名义上解散了，实际上活动更隐蔽，更狡猾了。这个时候，经过杜心源、米建书、郭辅仁、王际康等人一番密谋策划，确定要我出来承头，由王际康转告我，并特别告诉我不要再提杜心源了。从此，“三老会”就由我出面领导，杜心源等幕后指挥。

为了扩大“三老会”的反动势力，在全川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经过多次策划和行动以后，组成了由我统一领导的全省的“三老会”组织。一九六七年六月下旬，在公交系统由我、董绍琪、赵化南、张海如、高尚礼、张三奎、欧阳天等七人策划，于七月一日成立公开组织“四川省受迫害干部造反联络站”（简称“七一”联络站），又以联络站的形式取代了“囚干团”而掩护“三老会”的活动。继后又经过我和王豪、张伟民等人策划，把文教系统的“五七战团”中的“三老会”成员合过来。经过我和杜孚生、熊曙东、张伟民等人策划，通过成立所谓“为解放受迫害干部联合调查办公室”，把地下党领导小组中的“三老会”成员合过来，经过我和一些人的活动，把成都市“红五月”中部分“三老会”成员合过来。再通过“米、郭集团”，以及和重庆、南充、绵阳等地的所谓“三老”干部的单线联系，秘密串连，就最后组成了一个由我统一领导的全省范围的反动组织“三老会”。

六七年十一月，由我、熊曙东、杜孚生、张伟民、陈伯纯、苏云、张方舟等

人成立了“三老会”大搞翻案的办事机构“为解放受迫害干部联合调查办公室”，主要领导人是我，具体工作由杜孚生负责。办公室内分设对地下党干部和对老红军、老干部两个调查小组。地下党小组由杜孚生、陈伯纯负责，老红军和老干部小组由张伟民、王豪、高尚礼负责。这个办公室用“三老会”的名义在重庆等地作过所谓调查，在成都市设立了“三老受害登记处”，公开在社会上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大搞翻案复辟活动。“七一联络站”是“三老会”控制操纵的半公开组织，是“三老会”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第二道防线。“七一联络站”的总部是“三老会”的第二个核心，是插手群众组织，伸向专、州、市、县，妄图控制全川的一个“三老会”的公开组织。“七一联络站”我是领袖，王豪是第二把手。“七一联络站”有成都分支、铁路分支、水电分支、基建分支。为了控制全川局势，六七年九月，我提出在全省各专、州、市、县设立“七一分站”。实际上有些地区已经建立“七一分站”。

“三老会”就是由李廖死党的同伙和一伙反革命为骨干串连起来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秘密地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地下阴谋集团。它的组织有明的，有暗的，有的在幕前，有的在幕后，组织关系明暗结合，暗的指挥明的，暗的通过核心成员秘密串连，明的通过“七一联络站”把黑手伸向专、县，发展到全川，它有一套秘密的、狡猾的活动方法。“三老会”的活动，无论是明暗之间，上下之间，横直之间，都采取秘密的单线联系。“三老会”的头目与核心成员开黑会，人员不固定，时间不固定，中心联络点随时变更，鬼鬼祟祟，搞特务活动。“三老会”内部严格规定，不以“三老会”名义对外，主要头子的活动要保密。它不以组织名义召开大会，而只采取开小会和个别秘密搞黑串连的方式进行活动。会议不留记录，情报工作绝对秘密，由我亲自掌握，重要情报不能形成文字，只能口头交谈，形成文字的情报不能落款。如果出了事故，一概由当事人自己负责，不能暴露“三老会”。从我们这一套活动方式也完全证明了“三老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组织，我们这一伙，就是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为最终目的的资产阶级右派、牛鬼蛇神。

(2) “三老会”的反动纲领和主要的反革命罪行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它们的政权。”反动组织“三老会”就是一伙反革命向革命势力斗争，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组织。

“三老会”是一个大搞右倾翻案大搞复辟活动的反革命集团。“三老会”的反动纲领，就是疯狂地大搞翻案夺权活动，通过翻案达到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我们提出了“受迫害干部团结起来，联合起来，不仅要翻文化大革命中的案，还要翻十七年历次政治运动的案，就是要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要以受迫害干部为核心来掌权。”十七年的历史，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是社会主义的历史，我们叫喊“受迫害干部团结起来”，把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就是号召牛鬼蛇神起来翻案，推翻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让牛鬼蛇神上台，恢复蒋介石国民党统治的旧中国，真是反动透顶！

在这个极端反动的纲领下，我们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反革命口号，什么“敢不敢支持牛鬼蛇神翻案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啦，“要敢在‘牛’字上做文章，要翻案一翻到底”啦，“已经被打成反革命，不怕再当反革命”啦，目的只有一个：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为了实现这个反革命的罪恶目的，我们大搞翻案夺权的罪恶活动。为了夺权，首先要翻案。我们“三老会”的核心成员经过多次密谋策划，制定了一个庞大的翻案计划和策略，翻案步骤和方法，研究了如何通过翻案达到向无产阶级夺权。我们的计划，就是要把十七年历次政治运动中从干部队伍中清洗和实行专政的叛徒、特务、右派和受过徒刑处分的案子全部翻掉。我们推算全川有三十万所谓“受迫害”的干部，狂叫“三十万统统都要翻”。特别是重庆、成都、宜宾、绵阳最突出，要首先翻。我们的翻案策略是：1、大造翻案的反革命舆论；2、假手于群众组织；3、抓典型，抓大案，以点带面。

首先，我们大造右倾翻案的反革命舆论，充分利用刘、张“受压就是左派”“受压最革命”的反动论点，把我们这伙历次政治运动被清理、被批判、被处分的牛鬼蛇神，有严重问题的人标榜为“受害者”，打扮成“左派”，号召他们起来“造反”，起来“翻案”，一翻到底。我们炮制了三篇极其反动的反革命黑信广为散发，即：致老红军的一封信，致老干部的一封信，致老同志的一封信。公开动员牛鬼蛇神起来翻案，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大右派杜孚生，炮制了“四川第二个突破口”的黑文章，在社会上广为散发，胡说刘、张是四川第一个突破口，他是四川第二个突破口。我还审定修改了李子厚执笔写的一篇社论，题为“打倒坏人，发现好人”。胡说什么过去认为是好人的，现在看来多数是坏的，不是走资派就是老保；过去认为是坏人的，多数是好人。这就完全颠倒了敌我，混淆了是非。按照我这个反动观点，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好人都成了坏人，那些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大多数成了好人。这不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逻辑么？这个反动观点，就是为牛鬼蛇神翻案张目，鸣锣开道，就是为推翻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造反革命舆论，就是要恢复那种由少数人压迫、剥削多数人的反动统治。

在大造反革命舆论的同时，我们精心策划，要利用群众组织为我们翻案，不能由“三老会”直接出面，以免暴露自己。我们派出了“三老会”的主要骨干力量，像我、杜孚生、熊曙东、张伟民、高尚礼、张方舟等人，分别混入一些群众组织进行游说，欺骗群众，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成立了所谓“解放受迫害干部联合调查办公室”。这个办公室表面上挂了群众组织为名，实际上就是我们“三老会”搞翻案的专门机构，由“三老会”的领导小组我、张伟民、杜孚生、高尚礼、陈伯纯、张方舟领导，由我主要负责。办公室日常工作，由杜孚生负责。我们还在成都市设立了一个翻案办公室。这就为我们大搞翻案活动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

根据我们策划的“找出典型，以点带面，逐步推广”的翻案策略，我们确定了第一批翻案的计划，第一批翻案的重点地区在成都、重庆、绵阳。成都二十余

人，重庆十余人，绵阳十余人。共计五十余人。第一批翻案的对象，我们选的黑典型，就是那些历次政治运动问题最多、影响最坏、名声最臭、罪恶最大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各种反动分子。例如，地下党方面，川南地下党廖林生是右派，川西地下党杜孚生是大右派、叛徒，川北地下党熊曙东是叛徒、特务，陈伯纯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重庆张文澄、陈孟汀都是大右派，红军干部方面，重庆刘文全是反党分子，匡根三是四清下台干部。绵阳汤成功，在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犯严重错误。省级机关我是一个屡犯错误，屡教不改的蜕化变质分子，杨朝宗、张三奎都是四清下台干部。老干部方面，省级机关赵化南，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刘风勃，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挨过斗受过批判。成都市郭辅仁，是四清下台干部，郑瑛，是五七年反右斗争犯过错误，张方舟则犯过严重错误。还有绵阳的张长富（注：后文写作高长富、高兴富）、阎文秀、杨泽民、刘仲和，重庆的王墨林，雅安的董代成等等，都是臭名昭著的大叛徒、大特务、大右派、大贪污犯和有各种严重问题的人。除了这五十几人以外，我们还要为闻名全国的两个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翻案，一个是泸州的邓（自力）、崔（璋）、陈（华堂）案件，一个是重庆的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案件。我们还要为《红岩》作者、叛徒罗广斌的自杀翻案，为“双枪老太婆”陈联诗翻案。单从这个第一批翻案的名单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是一场向无产阶级发动的猖狂进攻，这些案子都是十七年历次政治运动处理的大案，反党集团案。这是一个重大的反革命行动，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阴谋。没有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历次政治运动的胜利，就没有今天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如果都翻了，其他案件也就不在话下了。十七年的历次政治运动也就被否定了。十七年来无产阶级专政也就被否定了！我们的反革命目的，就是要在第一批翻案中首先抓这些在全川有影响的大案件，使全川在十七年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清洗被专政的牛鬼蛇神在这些典型、黑样板的带动下，来一个全面翻案统统翻，翻案之后，又依靠这些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让我们这一伙叛徒、特务、反革命、走资派、牛鬼蛇神上台掌权，实现我们同刘、张共谋所谓“以受迫害干部为骨干掌权”，即依靠牛鬼蛇神掌权的复辟阴谋。我们这个罪恶目的，就是要推翻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真是反动透顶。我们这一伙反革命，尤其是我这一个反动组织的头子，实在是罪大恶极！我再次向人民低头认罪！

为了实现这个翻案罪恶计划，我们以“解放受迫害干部联合调查办公室”的名义，先后派出由“三老会”骨干成员组成的几个翻案小组进行所谓调查。调查组到绵阳为高长富、阎文秀、杨泽民等人翻案；到重庆为张文澄、陈孟汀翻案；在成都为郭辅仁、郑瑛翻案。杜孚生竟然亲自出面为自己翻案。我们还绑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廖志高的老婆郑瑛，妄图为廖志高、王月生领导的西昌双轨党翻案，真是反动透顶。

翻案是手段，夺权才是我们反动活动的最终目的。我们多次策划，要随着翻案的分批实现，分批地打进各级革命委员会，篡夺各级领导权。省革委建立之前，我们就研究过干部问题，我们通过各种渠道，直接地、间接地提出来，想钻进省、

市、专、州革委会中，并且要占一定的比例，把权抓到“三老会”手里。我们采取三种方式推荐干部进行夺权：

（1）群众组织提结合干部名单时，我们趁机提“三老会”的人，也提一些虽然不是“三老会”，但拥护刘、张也支持我们的人，以便更好地掩人耳目，欺骗群众。

（2）我们的意见促使群众组织同意，由群众组织向省提出建议。如提绵阳地革委结合干部十几人就是由绵阳“三老会”成员策划研究提出的，而后又拿到成都市和我们研究，经我们同意再由群众组织名义提出去的。

（3）我们直接向刘、张和有关领导机关提出建议，张西挺叫我们向成都警备区提出成都市结合干部名单，我们提出成都市第一批参加结合的副局长以上干部15人，其中“三老会”成员将近半数，有郭辅仁、张方舟、贾庚羽、高心德、彭塞、解成仁等。

我们有一个第一批翻案的计划，也有一个第一批打进各级革委会夺权的计划名单。六七年十月份我给张西挺写了一封信，推荐了几十个干部。这是我和张伟民、王豪、高尚礼、王兴友交换意见之后，由我起草的。我们提的主要是“三老会”成员，第一批要在省和专、市、州掌权的人，我们提了“三老会”核心成员和与“三老会”有关的几十人，如万县赵唯，达县李丙甲、熊曙东，南充张涛、张元和，绵阳汤成功、高兴富、杨泽民，温江侯国才、曾茄，雅安李振华、董华成，梁山陈怀堂，省级机关王际康、董绍琪、赵化南、刘风勃、张伟民等等。我们居然把特务、旧省委书记、李井泉同伙杜心源，副省长、走资派张呼晨也提出来了！按照这个名单，把李廖死党把牛鬼蛇神统统塞进各级革委会，就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篡权复辟！就是刘少奇、李井泉复辟，蒋介石复辟。

经过我们一番阴谋活动，在刘、张的支持和包庇下，“三老会”的翻案篡权阴谋逐步实现，一些“三老会”的骨干成员和与“三老会”秘密串连活动的人，陆续地钻进各级红色政权。比如，我这个罪大恶极的反动“三老会”的头目，过去又犯过严重错误，被刘、张包庇解放，而且结合为省物资局的负责人之一，并打算要我当政工组的副组长。其他如王际康、姚振声（注：原四川省邮电局局长，1968年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委员）、董绍琪、王豪、熊曙东、董化成、陈怀堂、刘志华、欧阳天等人，都钻进了省、专、市和省级直属局革委。

为了实现翻案夺权的这个罪恶目的，我们有一套野心勃勃的黑计划。我们要在上层建筑中建立一套翻案、夺权的黑班子，策划把四川分成四个省，恢复川东、川西、川南、川北，便于由我们篡权。还计划发展农民组织五百万到八百万占领农村阵地，实行农村包围城市。

我在六七年九月底说过：“我们要加紧串连，串连的面要广，人要少而精，要做到各部门都有我们的人。”六八年一月，右派分子苏云到北京去汇报，欺骗中央文革时，提出过把四川分成四个省的方案，说什么四川太大，一个省革筹管不了，要分设四个省革筹，这样位置一多，更便于我们钻进去篡夺复辟了。为了控制全省，我在六七年九月，提出过发展农民组织五百万到八百万的计划，而且

召开过两次黑会，进行具体策划和研究。我提出叫重庆要巩固六十万的实力，还要在郊区和邻近县分别发展力量。要绵阳组织一百万的力量，要南充组织三十万人改变形势。其他专区也要组织十至三十万，小的专区如雅安也要有五万人。这样，就有了五百万至八百万有组织的群众队伍，作为支持我们翻案夺权的雄厚力量。为了实现这一个黑计划，我和冯建平、王豪等策划扩大农村势力，发展农民组织，以“三老会”核心成员王豪、冯建平、刘坚戈、高尚礼、王国金等人组成黑参谋部，由我们发起串连十几个农民群众组织的代表在成都开会，倡议全省搞农民统一的大联合组织，并想搞常设机构作筹备农代会的基础，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反革命阴谋，这样一来，就使“三老会”把反革命势力一直伸到农村，控制全川。形势好，农村可以保卫城市。形势不好，农村可以包围城市。在我们的策划下，于十月中旬召开了四百余人的贫下中农代表会议来落实五百万至八百万的黑计划，会议进行过程中，被张、梁首长发觉制止，斩断了我们伸向贫下中农的黑手。李井泉被打倒之后，就提出过什么农村包围城市的反革命计划，我们也提出这个农村包围城市的反革命计划，说明我们完全同李井泉一个鼻子出气，是一丘之貉。

为了实现翻案夺权复辟，我们也要抓群众，欺骗和利用群众为我们自己服务。我们要在文化大革命中捣乱、破坏，采用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插手两派，挑动群众斗群众，指挥武斗，挑动革命群众互相残杀。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反革命分子怎样耍两面手法呢？他们怎样以假象欺骗我们，而在暗里却干着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呢？这一切成千上万的善良人是不知道的。”我们这一伙人就是毛主席指出的，在暗地里干着革命人民意想不到的反革命勾当。

我们是怎样在群众中大搞阴谋活动来破坏文化大革命呢？

我们的主要手段是：以当参谋为名，打进群众组织，假手于群众组织，在两派群众组织间挑拨离间，煽阴风，点鬼火，制造武斗气氛，极力挑动群众组织的派性，挑动群众斗群众。

我们为了投靠刘、张，采用特务手法，为刘、张窃取情报。我们“三老会”的核心成员，分别插手两派，我们叫“三老会”的干部以伪装的面貌出现，接近“红成”，搞“红成”情报，为个人野心家刘、张压垮“红成”提供材料，如“红成”头头关于夺权的报告，我们派人听了，全文记录了下来，马上送交王际康打印后送给刘、张。王力来川之前，刘、张要“红成”人数，我们提了一个与“红成”自称的人数有差距的数字，刘、张报告王力，王力以此压“红成”说：“‘红成’虚夸力量，实力威胁。”我们还搞了十几件机密的调查，搞“红成”的情报，如“红成”所谓绑架张西挺事件，“红成”派人到印刷厂抢走王力报告事件，我们还用特务手段查到了去抢王力报告的领头人员×××，报告了刘、张，刘、张支使一个群众组织把此人非法逮捕审讯。我们还策划找刘结挺批准高尚礼、张三奎打入“红成”上京告状团摸情况，抓黑手，必要时在“红成”内部策反，分化瓦解“红成”。高尚礼后来混入“红成”上京告状的队伍，跟踪盯梢，刺探情报，

跟到广元才折回。在打击、陷害、镇压“红成”小将方面，我们干了大量罪恶活动。

在刘、张执行武装一派、消灭一派，残酷镇压群众的反动方针下，我们这伙人唯恐天下不乱，趁机兴风作浪，挑拨离间，煽动武斗，制造武斗气氛，策划指挥武斗，血腥镇压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犯下了不能容忍的罪行。

我们首先煽动武斗气氛，编造谣言在社会上广为传播，意图制造武斗气氛，煽动两派对立情绪。

我们还策划指挥武斗，我亲自当武斗参谋长，坐镇指挥。我还帮助某厂部署防御，并派王兴友去当参谋，王脱了军装去现场指挥设防，视察武斗工事等。

我们还策划插手专、市、县武斗，如雅安、达县、德阳、重庆我都出过点子。我们还参与指挥抢枪的活动。罪恶累累。

中央首长指出，武斗表现在群众，根子在刘、张，背后有敌人。我们这一伙的罪恶活动就是铁证。由于时间关系，我在这里就不一一交待了。

以上是我对反动组织“三老会”的组织、反动纲领和罪恶活动的主要事实的初步坦白交待。“三老会”是由李、廖死党和一伙反革命为骨干组成的一个翻案、夺权、复辟的地下反动组织。从它的纲领和我们已经付诸实施的行动计划，从我们提出第一批要在全省为牛鬼蛇神翻案的名单和第一批打进各级革委会的名单，从发展农民组织五百万到八百万的黑计划，从煽动群众组织的派性，策划指挥武斗等一系列极其猖狂的罪恶活动可以看出，“三老会”这个反动组织干的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勾当，就是要翻案，就是要夺权，就是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恢复地、富、反、坏、资产阶级失去的天堂！我们就是这样地把剥削阶级复辟的希望变成了复辟的行动！“三老会”反动透顶，完全应当取缔！应当实行坚决镇压！

第二个问题，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刘、张是如何支持、重用、包庇“三老会”的。

反动组织“三老会”这样反动，但是却长期在社会上、在全川范围内广泛地进行反革命活动，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中央首长指示要镇压后，长达两年时间内得不到应有的制裁，就是因为“三老会”的翻案复辟活动是得到个人野心家刘、张直接支持、包庇的。

从一九六七年五月以后，刘、张就先后多次接见过“三老会”的成员，程占彪、董绍琪、王墨林、王公杰、王兴友、熊曙东、田忆秋、徐兴凯、李子厚等，其中我和其他一些重要成员刘、张还多次接见过。刘、张对反动组织“三老会”的组织形式、反动纲领、活动方式、保密措施、联络办法，都有过许多指示和交待。

我们和刘、张保持经常联系，主要通过以下四条渠道：（1）“三老会”头头和主要成员直接和刘、张联系，程占彪、董绍琪、王兴友、熊曙东、王公杰、王墨林、李子厚等先后都受刘、张接见并下达黑指示，这些人也向刘、张汇报过活

动情况。六七年五月，刘、张还给董绍琪发过军区出入证和联系电话号码。六七年十一月又专门向王兴友规定了特别的联络暗号，即进军区东营门在接待室写条子，如来一人也要写二人，会一人也要写成张西挺等两人，署名，如果来程占彪一人也要写王兴友二人，这样表示有重要事提供，她好接见。规定重要材料交028（注：指当时驻成都的解放军空字028部队，即空军第十三航校，其群众组织028红总属于成都的八二六派，其成员有许多被安排在四川省革筹组办事机构工作）×××等转刘、张，一般材料交某单位×××转刘、张。（2）通过028×××和刘、张联系。六七年十月初，张西挺接见我就是由×××电话通知我到军区五号楼的。（3）通过省筹办秘书组×××，党群组×××，调研组×××、×××向刘、张反映情况转送材料。（4）通过田忆秋与张西挺秘书丁祖涵单线联系。

从一九六七年五月刘、张回四川以后，我们一伙从反革命的本能出发，认为刘、张飞黄腾达是我们可以翻案、夺权、复辟变天的靠山，于是我们策划反动组织“三老会”一定要得到刘、张支持，便利用董绍琪和刘、张是老同事的关系，派董绍琪向刘、张汇报了“三老”干部串连情况，刘、张当即表示支持，并希望“三老”向他们反映情况。一九六七年十月，在要不要扩大这个反革命串连组织问题上，我们内部发生了争论，我们又派董绍琪去请张西挺出面来解决，张西挺说：“串连活动可以，内部意见分歧是常有的，你们自己协商解决。”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我向张西挺汇报了“三老”干部串连情况，张西挺对我们搞的反革命串连活动表示满意，张西挺还给我们出主意说：“你们自觉的，自愿的，自动的搞革命串连活动，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你们继续串连，但不要在社会上公开。”张西挺还对我说：“你们继续串连，反映情况就行了。人家（造司）也有个干部组织，我们没有承认，如果你们公开，承认你们，不承认他们，我们不好办。”张西挺还给反动组织“三老会”规定了任务，就是“了解情况，落实情况，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我们进一步向张西挺谈到我们要翻案的问题时，张西挺说：“迫害干部是李井泉的一条罪状，就是要揭发，受迫害干部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张西挺完全同意我提出的对一些案件进行调查，支持我们大搞右倾翻案。

反动组织“三老会”在大搞右倾翻案，向无产阶级夺权的罪恶活动中，不断得到刘、张的黑指示。为了扩大右倾翻案活动，大造反革命舆论，我们向张西挺要求批准我们办一个小报，登一些所谓受迫害干部的情况，我还向张西挺说，我们要出一个刘、张受迫害的专辑，张西挺对我说：“办报可以，不过你们公开的单位，单独办不太好，最好你们同群众组织合办。你们有人才，可以写文章，一样能达到目的。”随后张西挺就派右派田忆秋来参加我们办报。反动组织“三老会”大造反革命舆论，炮制了许多毒草，纷纷在一些群众组织小报上出笼，这些毒草既无耻地吹捧刘、张，也乘机吹嘘我们这一伙牛鬼蛇神。

反动组织“三老会”依靠刘、张向无产阶级夺权，刘、张又利用反动组织“三老会”为他物色营造独立王国的反动骨干。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注：此日期有误。原文如此），我给张西挺一封信中提出建议：各级革委会安插干部时，“要以受害干部为骨干来掌权，才靠得住。”同时提出“三老会”正在对干部进行彻

底排队。这封反动信件是由王兴友亲自送给张西挺，张西挺对王兴友表示，同意我这封信的反动内容，并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认识是一致的。”所谓“由受迫害干部来掌权才可靠”，就是由我们这伙反革命向无产阶级夺权，这就是反动组织“三老会”和刘、张在夺权问题上统一的行动的纲领。

一九六七年十月，张西挺对我说：“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省和专市革委会的准备工作，你们在干部方面做了些工作，了解情况，你们可以提出建议。”这说明是刘、张向我们敞开大门，提供方便，让我们这伙牛鬼蛇神进革委会嘛！根据刘、张的黑指示，我们先后直接或间接向刘、张推荐几十个所谓骨干，结合进各级革委会，使得像我们这样一小撮坏人，钻进了革委会，窃据了人民的一部分权力。

一九六八年一月，李子厚找到张西挺，要她对“三老会”翻案夺权活动给予支持，李子厚对张西挺说：“你们自己解放了，还有很多人没有解放，你们不要忘记了，不要变了。”张西挺向李子厚保证说：“我们不会忘记，也没有变，现在不过是增加了几层卫兵（指军区的岗哨）。”张西挺说的“不会忘记”，“没有变”，就是明确告诉我们，刘、张没有忘记我们这一小撮牛鬼蛇神，她要依靠我们这一小撮牛鬼蛇神，我们也就拚命依靠刘、张这一个靠山，大搞翻案夺权活动，死心塌地为刘、张营造独立王国服务。

六七年七月，刘、张叫某单位×××向我和高尚礼传达要我们参加“联合动态站”，这是刘、张利用一些群众组织搞的情报站为他们搞情报的。我们在“联合动态站”中侦察地总“红成”的政治动向，搞“黄角会议”、“重庆会议”、“雅安会议”以及其他情报。搞五十四军、五十军、铁道工程兵、通讯兵以及若干军分区、县武装部和军事院校支左方面的情报，我们搞这些绝密情报，通过我们搞的内部简报“红色观察哨”以及某单位×××转报刘、张，刘、张对这些情报很重视也很关心。张西挺对王兴友还交待了搞情报工作的方法，张西挺说：“搞情报要特别注意保密，笔记本要用软的，笔记本上不要写姓名，记人记事用代号，失掉了不会出问题，如走路坐公共汽车，遇到不利的情况时，把笔记本丢掉，以便脱险。”

一九六七年十月张西挺接见我时，我拍着她的肩膀悄悄向她透露有人调查她的历史问题时，她对我说：“哼，让他们调查吧，老程，你相信我没有见不得人的事。”

中央首长在“三一五”指示中指示：“‘三老会’反动得很，要坚决镇压。当然要区别对待。组织要解散，核心成员一定要专政。”中央首长的指示击中了刘、张和反动组织“三老会”的要害，这对我，对刘、张都是一个粉碎性的打击，刘、张为了逃避他们支持反动组织“三老会”的罪行，我们为了逃避人民的制裁，策划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正像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的那样：“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中央首长“三一五”指示以后，我们采取了“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的反革命策略。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日，我和王豪等人密谋，订了三条攻守同盟：1，不承认我们是“三老会”，只承认我

们是“七一联络站”；2，有计划的把骨干成员转移隐蔽起来；3，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把杜孚生抛出去，说杜搞的“三老”登记站，就是“三老会”。六八年六月，我亲自给张西挺写信告诉她，成都地区所谓干部组织有三个，要刘、张定调子，就是给刘、张出主意，同刘、张对口径，抗拒中央，说我们不是“三老会”。当成都市揪出“米郭集团”以后，我们认为形势更紧张了，就按原计划采取“金蝉脱壳”的办法，把杜孚生抛了出去，把“三老会”组织暗藏下来。在刘、张的包庇下，在中央首长“三一五”指示要坚决镇压“三老会”后近二年的时间里，由于我们顽固抵抗，由于刘、张百般包庇，反动组织“三老会”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制裁。在刘、张支持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一九六八年七月，我和王豪在省革委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又一次订了攻守同盟，当时我对王豪说，听×××说，在军区、省革委碰头会上，有人问刘、张：“七一联络站的问题你们知道不知道？”张西挺看刘结挺，刘结挺看张西挺，都没有承认。王豪说要体谅刘、张的处境，刘、张给我们承担责任，我们也要给刘、张承担责任，就是挨打也不能说。在刘、张和叛党分子陈沐控制的学习班里，我们一伙“三老会”的头目和核心成员都被包庇下来，学习班工作人员×××直接对王豪说：“不准承认‘三老会’，如果谁要你写‘三老会’的材料，你就顶回去。”我们心领神会，这决不是一个工作人员的意见，而是刘、张给我们定下的调子，我们也就照这个调子办理，长期不交待“三老会”的组织情况和滔天罪行。

六八年九月，刘结挺对董绍琪说：“哈哈，人家抓你们‘三老会’呀！老程搞两面派没有？”刘、张为了包庇和利用“三老会”人员，于一九六九年秋天在省革委的干部座谈会纪要上规定“三老会”干部串连组织不必追查，按本人在本单位的情况进行审查，应解放的予以解放，不要因此而影响对这些干部的解放。刘结挺又在省党代会上谈解放干部问题时说：“解放程占彪可以影响一大片。”这就是首先解放我这个“三老会”头头反动首领，随之而全部解放“三老会”成员和与“三老会”有关系的人，进而把这些人塞进各级革委会，作为刘氏独立王国的反动骨干。六八年六月，省革委政工组副组长×××到五七干校对我说：“我这几天只找几个负责干部谈谈，在二营就是找你谈了。你是有名人物。”还特别说明：“张西挺问候你，上面确定要解放你，你要争取群众谅解，早日解放，我们和干校再做工作，上面对你的工作是有安排的。”不久果然解放了我，把我安排在物资局的领导班子里，听说还有重任的打算。这不是刘、张对“三老会”明目张胆的支持、重用和包庇，对中央首长“三一五”指示的对抗又是什么呢？

在刘、张包庇下，“三老会”的人，已翻案解放的有程占彪、姚振声、张伟民等六十余人，已经钻进省、地革委掌权的有王际康、程占彪、姚振声、王豪、刘风勃等四十余人。

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重庆市市中区“三办”翻印

一九七一年五月三十日

【故纸堆】

最高指示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成都军区梁司令员、刘结挺副政委
接见开江、万源、巴中等七个县
驻军负责同志、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的讲话

渔歌子 录入提供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梁司令员、刘副政委接见开江、万源、宣汉、渠县、平昌、通江、巴中等七县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与当地驻军负责人、县武装部的负责人，陪同首长接见的有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长、三十八师杨副师长，达县军分区王政委、王副司令员，〇〇二〇部队孙团长，还有省革委冯玉德、杨至诚副主任，以及当地驻军负责同志。

时间：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二十时三十分至二十五日

地点：〇〇二〇部队小礼堂

人刚到会议室，开江的一位群众代表发言：开江五·七联司还有三名代表没有进来。

梁：管他代表不代表，执行“七二三”布告就能代表，不执行“七二三”布告就不能代表。群众的代表，你们抢枪没有？（答：我们组织没有搞打、砸、抢，要求接见。）

梁：你们组织都是好人？没有搞打、砸、抢？没有打、砸、抢，一个坏人也没有？你是在强辩！强辩！你就不正确。（这时孙团长问刘副政委，三个代表可不可以进来？）

刘：叫三个进来受教育吧，学习“七二三”布告。

梁：你们开江几个组织？几个观点？（答：三个组织，三个观点。）三个组织就有三个观点吗？

梁：（将接见的首长一一作介绍）今天找你们来，是学习、检查、对照“七二三”布告执行怎样，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的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个布告，

虽然是山西的，全国都有，所有革命群众组织和个人都要坚决执行，绝对不许对抗，我们人民解放军有责任执行、捍卫“七二三”布告。

有的地方搞武斗，搞打、砸、抢、抄、抓，这难道叫革命吗？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摆事实，讲道理，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是十六条纲领性文件讲了的嘛。

文化大革命搞了三年了。一派压一派压垮了吗？革命的压不垮，不革命的不压也要垮。国民党蒋介石八百万军队不是垮了吗？因为它是不革命的，是反革命的，广大人民不拥护它，所以它垮台了。

你们达县搞了这么久的武斗，坏人没有打死，你们这些头头一个也没有打死，好人打死了。把达县搞成那个样子，国家财产遭受到严重的损失，我们省革委、军区这次到达县来，就是执行、捍卫“七二三”布告的，谁按“布告”办事，就是革命的，谁不按“布告”办事，就不是革命的，或是反革命的。谁再搞打、砸、抢、抄、抓，谁就是土匪，土匪就要消灭，不消灭留起来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七二三”布告是毛主席的重要战略部署，是落实“九大”精神的重大措施。

我不讲你那个什么“八一五”，什么“反到底”，一条一条的学习，一条一条的检查犯了些什么罪，现在怎么办？刚才这位同志说，你那个组织好像一千个正确，一万个正确，一个坏人没有，哪有那么一回事？可能在座的就有坏人。

刘：肯定在座的有坏人，肯定的有。

梁：怎么学？选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念，一条一条的学，看你们犯了哪些罪。

刘：找一个武斗的宣传队长念嘛。

（巴中一个群众代表自动报名读“七二三”布告，从头念到“犯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罪行”时，梁司令员又重念一遍。）

梁：你们是头头，你们有没有？是执行了还是抗拒？你们群众组织混进坏人没有？怎么不开腔？我不知道哪个派，我没到过达县。你是哪里的？（李仁禄：巴中的。）你是湖南人？（答：江苏的。）听你的口音像湖南人。讲一讲好不好？

（李不语。）都是好人，没有坏人？我不相信。你们都是头头，你们自己鉴定一下，是好头头还是坏头头？现在是鉴定的时候了。一个坏头头都没有？那毛主席是批错了？那是解放军搞的？武装部长、政委是坏头头？你们应该用尺子来量一下，有阶级敌人，有坏头头，你们觉悟了。你们是执行还是抗拒“七二三”布告？这都不敢说，没有勇气。（众答：有，坚决执行“七二三”布告，也混进了阶级敌人。）

刘：巴中杜泽海来了没有？（杜：来了。）你为什么把武装部长绑架到这里来了？（答：没有绑架，是找他来达县见梁司令员、刘副政委解决巴中问题。）你有啥资格弄他来解决？我们又没有打电话，就是绑架来的。（巴中刘部长：去年打了我的腰，今年又把我的头打伤了。）

梁：你把帽子揭了大家看一看。

刘：你们是谁搞的？（巴中杨××站起来答：是南江河××打的。）是你一个观点的吗？（答：是一个观点的，我们已经查清了，交给了南江。）（南江：没

有。)回去就交出来!随便打县武装部的部长那还行吗?你们武装进驻了县革命委员会,(答:是拿语录进驻的。)你们有啥资格进驻?县革委任何人都不准进驻!沈××是个什么人?(答:老红军,具体不了解。)你们把他弄来干什么?他是叛徒,是阶级敌人,老红军嘛也有坏人嘛,(梁插话:张爱萍也是老干部,也是叛徒,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她(注:原文如此。前面印的“他”,从此句看应为“她”)和国民党军官结过婚又混进来的。你们错了就承认错误,你们不要上当。我们把她留下了。她回不去。你们一个组织就派款三十万元,还说什么文化大革命经费,(杜答:纠正了,只取了一千多元。)根本就不应派嘛,我们共产党只是征税收,哪有派粮派款的?

梁:你是什么人?(杜答:邮电工人。)我看你不像个工人,连农民都不像。你支持叛徒、特务造共产党的反,进驻县革委,那革委会还有什么无产阶级权威?派款三十万,(刘:你们的一张条子就拿三十万。)哪个组织都有,哪个派都有,哪个观点都有,这像话吗?你和国民党差不多。我们共产党的天下,你把国民党那套搬来了,我看是不革命的。

(接着又开始读,读到罪行的第二条时,梁司令员又重读一遍。)

梁:检查一下犯罪没有?(宣汉军代表:八月十一日,革代会勾结达县××组织,用机枪袭击武装部,把我们谢得安副政委打伤,小便出血,在医院动都无法动。)

刘:这还了得?抓起来!

梁:(气愤地站起来,拍桌子)打解放军的给我站起来!(胡××站起来。)你是学生?(杨清明站起来。)你是个什么人?(答:补皮鞋的工人。)你是流氓!(王俊洪:冲武装部打解放军的还有人指挥。)是谁指挥的?是柳金球?(答:不是。)你是干啥的?(答:中学教政治的教员。)指挥打解放军你还不承认?

刘:你在贵州呆过。

梁、刘一齐站起来气愤地说:抓起来!(当场抓走。)

刘:同志们,他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那一套的,是个反革命分子,是混进群众组织的一个坏人,绝不是什么好人,绝不是什么造反派。

杨副师长:平昌解放军118人,就打了115人,只剩下三人出公差的未打。

梁:你看解放军有“五不”政策,就拼命的打。革命的,解放军就支持,反革命的,解放军就坚决打倒他。反解放军就是反毛主席,反革命委员会就是反毛主席,因为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伟大导师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是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人民军队,毛主席是中央军委的主席,毛主席是全国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刘录堂:川巴八一五里面有一个人,他哥哥是西藏军区的,他也在里面背枪。)不要提那个什么八一五派、反到底派,我不管你哪个派,要削平你那个山头。要那个,无非是这派压那派,争个山头,争个正确,争个大派,你还有什么?九江的鱼还是要回到九江去,是哪个单位的回到哪个单位,是哪个学校的回到哪个学校,是哪个工厂的回到哪个工厂,抓革命促生产,这才行。我们解放军开始有八路军,新四军,四个方面军,四个野战军,这是形势需要。全国解放后,

统一为人民解放军，抗美援朝又组织志愿军，现在统一就是毛主席亲自缔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也不需要山头了，我这个组织压你那个组织，你是“保”的，我是“革”的，“唯我独革”，“唯我独左”，“以我为核心”。

刘：总理早就讲了嘛，不存在什么“革”与“保”了嘛。应该归口闹革命，在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后，再搞这派那派是反动的，反革命的，归口闹革命，归口抓生产是大前提。

梁：宣汉什么四代会，三代会，你们头头一个也没有被打死。你们为什么不冲在前面？开江什么 6711，57 联司、210，还有什么部、站，谁给你们任命的？

（接着就读完。）

梁：检查一下犯了没有？怎么执行？（平昌解放军：平昌打了 115 个解放军，革委会也被砸了，公章也被抢走了。）

孙团长：坏蛋才颠覆新生红色政权。

梁：要削平山头，归口大联合，去搞斗、批、改。（刘录堂：“七二三”布告下达后，在广元还抢了七个库。）你们已经到了边缘了，广大群众是受你们欺骗的。

孙团长：渠县到万源去抢了三线建设的七个车，是土匪。

梁：你是什么人？（渠县红联站文龙：学生。）你枉吃饭。

孙团长：你们把一个十八岁的姑娘轮奸了，奸后几乎打死，现在还在住院，不是土匪是什么？

刘：你们达县地区八一五总部设在达县对不对？（刘金贵：没有。）是不是没有？（答：没有。）是不是没有？（刘再答：没有。）查清要找你。

梁：该收场了。你们达县 11 个县，反复多次还没有闹够吗？不能再有反复了嘛！

刘：现在的总部都是搞武斗的总部。

梁：你们再不回头，到时候，我们就要发动群众抽你的筋，剥你的皮，放你的血。跑到山上，派军队消灭土匪，跑到空中，我有的是飞机炮弹，跑到国外就按叛国投敌分子处理。

（渠县××组织代表再次要求接见。）

梁：算了，不要说，今天没有你们的发言权，今天是听我们的。你们得了浮肿病，现在肿得很厉害，再肿下去就要肿死了。什么别人是“老保”，只有你才是革命的，什么别人是“反红十条派”，你才是“红十条派”，只有你才是响当当的，同你观点的才是革命的，不同你观点的就不是革命的，你是响当当左派，我看你是响当当右派了。你们这些头头都要想去当座山雕，占山为王，你当座山雕，我们解放军有杨子荣，有很多个杨子荣。你们不对头，三年多的文化大革命，没有一点自我批评，总是说我那个组织比你的正确，一个坏人没有。坏的不能说成是好的，好的不能说成坏头头。你们心中没有人民解放军。是谁打出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谁在保卫祖国？（众答：解放军。）你们不知道，起码的知识都没有。你们眼中没有人民解放军，什么“歪屁股兵”，“刘少奇的兵”，“黑兵”，这

简直是反动的。过去你们造刘少奇的反，造李井泉的反，我们支持你们，现在你们要造解放军的反，就不支持你们。再要造解放军的反，就打倒你，就消灭你。当土匪，搞打、砸、抢、抄、抓，就要围歼你。你们要这样干好吗？你们把人民解放军放到哪里去？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工人、农民、广大人民与解放军有什么冲突？（众答：没有。）是嘛！这是毛主席的教导嘛！贫下中农内部也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李文忠同志不是有四句话吗：“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我们应当向李文忠同志学习，向人民解放军学习，你们一天到处打，你们有吃，你们一天还要多少钱，你这些人简直是败家子，到处杀人！到处放火！是不是土匪行为？

（秘书送来七县联防捍红指挥部的声明，梁司令员读给到会的人听，读完。）

梁：巴中的杨照国来了吗？（杨站起来。）你简直是胆大包天，你这个北路纵队司令，被我这个成都军区司令拿获，你是什么人？（杨答：汽车工人。）那你为啥要去搞武斗？帮人去打××地方？（杨答：打××地方是达县张××叫我去的，其它的事我不晓得。）你还不晓得？（刘录堂：去年枪毙苟杨国，他打的第一枪，两次带头冲监。渠县军代表：去年冲监，打伤我们司务长，至今还不能说话。残废了。又打伤我的手杆。）

梁：（拍桌子）抓起来！（当场抓走。）坏头头一个一个的抓起来，坏头头为什么不揪？你们自己揪，不揪，不叫革命派。这样的坏头头，坏人，不揪还行？你们保护了坏头头，你们哪个敢保护坏头头？（众不语。）搞打砸抢的人，搞武斗的人，今天不抓你，明天、后天都要抓你。不管你是哪一派的，只许有一个观点，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观点，不准有哪个观点。

刘：通江、巴中，武装颠覆革命委员会的，有种的给我站起来！你们必须把坏人交出来。

梁：那不是哪个地方，到处都有，哪一个群众组织都有。你们还不作自我批评？毛主席题的“革命委员会好”，你们到处攻打像话吗？像革命派吗？你们不像革命派。刚才说了“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你们心目中有毛主席吗？毛主席说：“造反有理”，有理才造反，今天是红色政权，你们还造吗？你们夺啊那不错吗？大错特错！你们还要搞打、砸、抢，不上交武器，总有一天要倒霉。文化大革命搞了三年了，还到处打、砸、抢，你们以为你们老本很雄厚。

刘：有的根本就没有啥老本。

梁：还有啥老本吃的？有的本来就没有老本。中学生，小知识分子，不会种田，不会插秧，可能你老子也不会种田不会插秧，什么时候种稻子都不知道。我看你吃够了，不立新功，像你们这样的人，我们不能把班交给你们，交给你们我们这些脑袋就要下地。

哪一派交枪就保护他。哪一派不交枪，就进行军事包围，逃跑就追击。

梁司令员指着巴中代表说：你是哪里的？有派性没有？（吴有秀：地革委常委，有点派性。）（王政委插话：派性严重得很。）有派性不能当委员，要坚决反

对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你们心中没有毛主席，你们“私”字多，“公”字太少，资产阶级派性太多，无产阶级党性没得。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都要倒霉，垮台。王明、高岗、饶漱石都垮台了，张国焘都垮台了，现在他在香港投靠美帝，卖小报，一个月拿几十元钱维持生活。你们还是搞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革命的大团结，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你们要多多学习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的伟大经验和革命阶段性，现在是斗、批、改阶段，要一个一个单位搞。你们在搞破坏斗、批、改，破坏文化大革命。要立新功，不要吃老本。刘少奇，李井泉，你们达县的李香山打倒了，还要立新功。我造苏修、美帝、反动派的反已经四十多年了，也还要立新功。你们才三年嘛。

刘：有的根本就没有啥老本吃。

梁：你开江的吗？你是转业军人吗？是哪个军的？（答：四十二军的。）军长是我们现在副司令员。你保持解放军的光荣传统，××是你们的头头吗？（答：是。）不要再上他的当了。他那一点军事指挥算不了什么，你们有勇气，回去把他交出来。坏人，你们就是要把他交出来。你们有几个武斗连队？（答：两个。）你不老实，你们是四个连，还不老实。（刘：你们这些屡犯，“七二三”布告下达还顽抗。）

梁：要无条件地上交一切武器装备和物资。不能说什么城内交了城外交，城外交了城内交，要立即无条件的全部上交。

刘：要把那些“武斗有理”，“抢枪有理”，“不交武器有理”的反革命谬论批臭，达县还有什么抢劫汽车叫做“接管”，简直是强盗。

（秘书报告万源的到齐了。）

刘：万源你（初均）带枪跑，拒绝解放军检查，抓得有理。

梁：以后再拒绝检查，抓了就不放了。

刘：通江××（谢孝元）来了吗？（答：来了。）你跑到南充去干啥？（答：回报情况。）回报啥情况？你写信策划武斗。（答：没有。）今天你不承认，以后查明了非抓你不可。不要当坏头头了。以往当了，作了坏事，不要再受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头头的蒙蔽，主动交出武器，积极检举揭发坏人，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立功补罪。

梁：你们不恨刘少奇，不恨李井泉，为什么要恨解放军？你们可以打、骂解放军，是什么造反派？你们变了。你叫袁民吗？（答：是。）久闻大名，不知姓。我这个省革委副主任、军区司令员请你不来。（刘：是我们听你的，还是你听我们的？）（答：听首长的。）你穿的黄衣服，是抢的解放军的吗？（答：不是，是转业回来带回来的。）在哪个军当兵？（答：一军。）啊，黄新廷的军。当了好久？（答：十五年。）是共产党员吗？（答：不是。）啊，你进步太快了，我三儿子当了一年兵就入了党。你当过伪兵吗？（答：当过几个月。）伪兵有好的，有坏的，好的已得到信用，当了干部。你搞过打、砸、抢，抢过枪没有？（答：没有。）

驻军代表：他们在北沙等三个区（梁：当座山雕。）抢走二十六团汽车，抢

走军用物资，就连大衣都抢了。一天煮三顿饭，就抢三顿，就连我们养的一头猪和几个南瓜都抢走了，还打我们。（平昌驻军代表插话：我们 118 人，就打了我们 115 人。）

梁：混蛋！解放军的饭叫你白白吃了十五年，抢走的一切装备物资必须无条件的归还人民解放军，我看你很可能是右派。往往说别人是土匪，是右派，唯我独“革”的人，他自己很可能是右派。好吧，现在通过协议。（协议读完后）有意见吗？（众答：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就签字。

在签字的过程中，巴中的代表站起来向刘副政委请示，我们巴中那个情况，怎么和他们联合？要把巴中的情况向刘副政委回报一下。

刘：怎么没法联合？今天晚上不听你们那些。今天是贯彻“七二三”布告。

刘：归口闹革命，归口抓革命是大前提，在“九大”以后拉起来的山头概不承认。再搞这派那派是反动的，反革命的。开江的四个组织联合，渠县三个组织联合，开江的 8711 司令员，渠县的三汇兵团为什么你们排斥他们？无非是他们小一点嘛！小组织不要争名额，大组织要照顾小组织。搞了大联合后，统统削平山头。我刚才讲了，联合了再搞这派那派是反动的，反革命的。搞吧！

梁：今天接见了统统回去，不能到外地。今天的传达由驻军统一传达，不能添言加语，攻击对方，否则就是罪上加罪。你们这几个县，执行“七二三”布告，已经晚了二十多天，这是对毛主席的不忠，又是一次犯罪行为。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和一切物资应当如数地立即无条件地上交给解放军，不准隐藏、转移，查出来就要给他处分的。

你们形式上是造反，实际上是搞打、砸、抢的，你们该觉悟了。犯了错误改了就好，犯了罪要立新功补罪。大敌当前，美帝、苏修、各国反动派竭力反华，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今天批评你们多，也批评得很厉害，是有好处的，是为了帮助教育你们。如果硬要犯，有什么办法，不回头，肯定走向反面。过去功劳是过去，今后再犯错误是不行的。你们知道的“四大领袖”不是劳动改造去了吗？

我们解决达县问题，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连讲三次）达县不解决彻底，我们是不走的。

今天是造你们的反。回去再搞就围剿你，包围你。相信你们不会再搞打、骂解放军了。要正确对待解放军，正确对待革命委员会，如果回去再搞就不要怪我不客气，把你打成反革命。你是土匪，不是造反派嘛！万源再冲 062 就开枪打死你！

如果是革命的就照办，如果不是革命的不照办。希望解放军，县、区武装部，专职武装干部，是革命的就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不支持，武斗是坚决反对，如果支持就是犯罪。我们解放军要把无产阶级专政柱石的权威拿出来，不能再叫他们欺负了。我们解放军不能亲一派、疏一派，更不能支一派、压一派，要“一碗水端平”，两派都要支持。

过去打了解放军的不追究，今后打解放军，就当坏人处理。

梁：我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认真搞好斗、批、改，夺取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

梁：“七二三”布告的八条坚决执行吗？（众答：坚决执行。）要言行一致。好，散会！

以上记录很不全面，也可能有错误，但总的精神没有记错，因为梁司令员、刘副政委在八月二十七日接见我们军队的同志时也讲了上述精神。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七日
四川泸州红联站翻印
一九六九年十月六日

【编读往来】

李辅、晓星谈《是谁杀了王尚志》

山西读者李辅来信：看了 25 期《昨天》所载赵瑜写的《是谁杀了王尚志》一文，知道了王尚志书记死去的真相。更清楚了文革残害干部的凶恶。王尚志书记是个善良、诚实、谦逊的领导干部，给我印象非常好，但一直不了解真正的死因。赵瑜分析得透彻，我完全赞同。

上海读者晓星来信说：《是谁杀了王尚志》一文选得好，文革中的矛盾和怪象几乎都体现在这个案件中，一文胜过许多文。

庄菁瑞谈唐山交大

25 期《昨天》张一哲对杜钧福意见的回复中提到唐山交大。那个时代的人都这么称呼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我父亲是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矿冶系 1946 年的毕业生。姚桐斌是父亲的同学，他是 1945 年毕业于唐山交大的。

唐山交大，1930 年被命名为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唐山交大抗战时期，1939 年初，迁往贵州平越。1942 年 1 月被改组为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下设唐山工程学院和北平铁道管理学院。1944 年因日军逼近贵州，交通大学贵州分校停课，1945 年 1 月再次迁校至四川璧山丁家坳。1946 年 8 月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迁回唐山，被更名为国立唐山工学院。因此，无论是唐山交大，交大唐院，还是唐院，这些称呼都是指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